

## 「異己」或「同胞」： 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及政策之探析

蕭文軒\* 顧長永\*\*

###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討與分析泰國的越南難民地位／身份的變化。根據越南人移入泰國的時間差異，可概略地將其區分為二：一是舊越南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移入泰國者；二是新越南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移入的越南人。由於舊越南人移入泰國的時間較長，久受泰國文化的影響，實際上已經被同化，與泰人差別不大。所以，本文探討的對象是所謂的新越南人。基本上，新越南人既是泰國的新移民，也是泰國眾多的少數族群之一，首先要面對的是來自泰國社會，包括：政治菁英、普羅大眾等，對自身的認知，這將進一步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制訂、社會的包容或排斥態度等，以及新越南人本身的認同意識變遷。其中，泰國社會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又經常受到對其祖國—越南的認識所影響。所以，泰國的越南難民的處境必然是與泰、越關係的發展具有高度相關性。這意謂著，必須將越南難民同時置放在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及國際政治等兩大層次來分析，包括：泰國的國族主義、邊境政治、冷戰體制等，才能確實掌握越南難民地位／身份的動態變化。

**關鍵字：**泰國、越南、泰越關係、越南難民、新越南人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一、前言

泰王國 (Kingdom of Thailand, 以下簡稱泰國),<sup>1</sup>就像其他的東南亞國家一樣,也是一個由許多族群所構成的多元族裔國家,主要包括:泰族(Thai)、華人(Thai-Chinese, Sino-Thai, 泰籍華人)、寮族(Lao)、馬來族(Malay)、吉蔑族(Khmer)及高山民族(Hill Tribes)等。不過,一般人也許不清楚,目前也有為數眾多的越南人(ethnic Vietnamese)居住在泰國境內,其透過陸路及海路,經過數個世代,從越南逐步遷移而來。<sup>2</sup>

如果從人口數量來看,移居海外的越南人實際上很難估計其精確數據,不過,根據越南共產黨所發佈的《政治局關於海外越南人事務第 36 號決議》(Nghị quyết số 36/NQ-TW ngày 26/3/2004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ề công tác đối với người Việt Nam ở nước ngoài)指出,旅居海外的越南人約有 270 萬人,其中有 80% 居住在已開發國家(Tạp chí Quê Hương trên Internet, 2004);更精確地說,旅居海外的越南人有超過一半居住在美國,依序為法國、中國、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國的越南人則約有 12 萬人,約佔總數的 5%。<sup>3</sup>此種人口分佈狀態,連帶影響到學界對於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對象選擇,主要集中在旅居美、加等北美國家及德、法等西歐國家的越南人(梁志明、游名謙, 2004: 16-17),針對泰國越南人的相關研究,數量則相對較少。在有限的研究文獻裡,又以 Peter A. Poole (1967a, 1967b, 1970, 1974) 與 Christopher E. Goscha (1998, 1999) 的研究著作最為重要。

---

<sup>1</sup> 泰國舊稱暹羅(Siam),1939年後改稱泰國,本文將依時空差異而交互使用暹羅與泰國。

<sup>2</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泰國曾先後出現過幾波越南人移入潮,包括:阿瑜陀耶時期(17世紀中期)、曼谷王朝初期(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拉瑪四世時期(19世紀中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在這些時期,越南人的遷移受到各種要素的驅動,例如:越南阮氏朝廷(Nguyễn Court)的宗教迫害、法國殖民帝國的壓迫、生活困苦與貧窮等;而其遷移路線則有海路與陸路等兩種方式。以陸路為例,主要是從越南的榮縣(Vinh)橫越安南山脈到寮國的他曲(Thakhek),再跨越湄公河抵泰國的那空帕儂(Nakhon Phanom),沿湄公河南下進入呵叻高原。該路線即是現今的第八號公路(Route Number 8)(Goscha, 1999: 19; Sripana, 2013: 530)。

<sup>3</sup> 根據 Louis-Jacques Dorais 所發表的文獻指出,旅居美國的越南人約佔總數的 55%,旅居法國者約有 40 萬人,約佔 15%,旅居中國者約有 30 萬人,約佔 11%,旅居澳洲及加拿大者約各有 20 萬人,約各佔 7%(Dorais, 2001: 3)。

簡單地說，Poole 不僅從歷史的角度說明越南人移入泰國的歷史過程，及其數量、分佈地區、地位等，同時，也探討泰國對外關係中的越南難民問題，包括：就難民遣返議題與南、北越政府的談判過程與結果。同樣地，Goscha 除論及越南人移入泰國的歷史過程以外，更深入研究泰國在越南歷次革命行動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然而，兩位學者的共同之處則是研究時間僅止於 1970 年代以前。1980 年代起，隨著國際環境與東南亞區域局勢的變遷，旅泰越南人的地位也產生轉變，不過，現有的相關研究文獻則僅有 Thanyathip Sripana 的論著而已 (Sripana, 2004, 2006; Sripana and Thin, 2005)，顯示該研究主題仍處於剛起步的階段。

近年來，因為越南經濟的快速崛起，無論在貿易或吸引外國資本的投資等方面，越南已是泰國的主要競爭者，所以，泰國社會從人民、媒體到政府單位等，都對越南展現出高度的興趣，這現象可從電視節目等媒體對越南等鄰國的持續性報導可略知一二。另外，亦如越南當局所指出：「多數的海外越南人已經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國的當地社群中，透過其經濟和政治地位，在越南與居住國的雙邊關係中，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力」(Tạp chí Quê Hương trên Internet, 2004)。2013 年 9 月 2 日，旅泰越南人協會 (Hội người Việt tại Bangkok,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ssociation) 在泰國曼谷正式成立，即為一例。該協會早在 2010 年 10 月就已經由旅居泰國各個省市的越南人協會代表初步形成，不過，直至 2012 年 7 月才獲取泰國政府的認證許可。在這期間，每逢春節、胡志明誕辰紀念日、越南國慶日等越南重要節日時，旅泰越南人協會都會舉行各種見面交流活動；除此以外，也積極參與泰越友好協會所舉辦的各項外交活動，例如：參加迎接訪泰的越南高級代表團等 (越共電子報，2013a)。由此顯見，旅泰越南人在現今泰、越雙邊關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文主要目的是要探討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及相關政策的動態變遷。本文認為，越南難民既是泰國境內眾多的少數族群之一，其發展必然深受泰國政府對少數族群之態度與政策的左右，而泰國政府的少數族群態度與政策又受到所處區域之地緣政治波動的影響，故而，必須將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發展置放在國際政治或區域政治的體系架構中來理解，才能完整地獲得釐清。承此，本文除前言與結論之外，將分成以

下四個主要部分來進行：第一，說明本文分析架構；第二，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人移入泰國的歷史過程；第三，分析冷戰時期泰國菁英及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態度與政策；第四，探討後冷戰時期泰國政府為順應區域局勢變遷及泰、越關係進展，從而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及政策上所產生的轉變。

## 二、本文的分析架構

理論上，就像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當代社會首先就是立存於國族國家（nation-state）體系中的國族國家，社會的邊界是由國族國家的領土邊界所劃定（Giddens, 1987: 1）。一個國家之所以是國族國家，至少意謂著，該國家主張（與被理解為）它是一個國族的國家：一個由一個特定、有區隔、並且有邊界的國族所構成，並為此一國族而存在（Brubaker, 1992: 29）。在理想狀態裡，國族國家是「一個國族，一個國家」（One nation, One state）；亦即，國家和國族具有相同的涵蓋範圍，其「政治界線」與「族裔文化界線」必須是完全重疊的。

在現實社會中，「一個國族，一個國家」並非常態。當今國際社會有將近六百個語言群體和五千個族裔群體居住在少於兩百個國家中，國族事實上遠多過國族國家。所以，國族和國家之間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符合問題」（Gurr, 1993）。然後，就像葛爾納（Ernest Gellner）所解釋的，為了鍛造高度同質性的國族，可以經由自然而然地交流、人口增衍予以達成，但這必須經歷一段相當漫長的融合過程，對於那些新興建立的國家，為了在短時間內建立一種同質文化、一個國家的理想，不得不以「暴行」通向消解差異一途來達到所謂的「共同體」（community）（Gellner, 1997: 37-49; 鍾永昌, 2003: 8）。

從字義來看，「共同體」和「共同」（common）有著極為緊密的關係。英文字 common 源自於拉丁文 communis。其中，com 等同於共同（common），munis 等同於防禦（defense）。故而，共同體除了象徵「有所共」、「彼此分享」（sharing）的包含（容）性（inclusion）意涵，更象徵排斥（除）性（exclusion）的意義，即是所謂的對立邏輯（oppositional logic）（Jenkins, 2004: 112; 鍾永昌, 2003: 1-2）。在群體意象中，除非一個「他」和「他者」（otherness）的意象也被建立，

否則「我」和「我群」將是不完整的 (Keller, 2003)。據此，建立「我群」與「他者」、「朋友」與「敵人」的關係就成為形構共同體的重要關鍵。

國族作為一種虛擬的政治共同體，不論是「想像」(Anderson, 1983)或是「被發明」的 (Hobsbawm, 1992)，其建構 (nation-building) 本身就是一種「空間淨化」(spatial purification) 過程。當國族成為對共同體進行想像的唯一方式時，為了在個體與名為國族的集體之間建立起緊密的連結，必須強調群體成員的共同特性，形成一種「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或「同伴情誼」(fellow feeling)，然後再反覆灌輸一種國族榮耀與忠誠於國族的國族意識。國家為達成國族建構的目的，必須透過與「有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 的參照和互動，藉以強化「我群」的認同意識 (Hall, 1996a: 597-598, 1996b: 4)，這是一種可以由內與由外來定義的雙重關係。<sup>4</sup>

概略而言，從內部來定義是指透過「內部他者」(other within) 來予以達成。所謂的「內部他者」意指和「我群」歸屬於共同政治實體，而且對「我群」的文化、領土等共同特性造成破壞的那群人，像是國族國家中的少數族裔 (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 (immigrant community) 等。如果是在一個多國族政治實體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 中，「內部他者」也可能是多數族裔或是小的國族 (Triandafyllidou, 1998: 599-603)。如果按照鄂蘭 (Hannah Arendt) 的說法，「國家—國民—領土」這個三位一體的體制是當代國族國家立存的根基，那些「被排斥在這個體制外的人民，就像一股不斷地從水位高漲的儲水池中洶湧而至的流水，正形成日益膨脹的運動，有摧毀整個基礎的危險」(鄂蘭，1982: 232)。以致於，這些外來者，特別是難民、無國籍者等，就成為國族共同體內部的異己。霍爾 (Stuart Hall) 認為，因為認同是在論述的內部 (within) 而非外部 (outside) 所建構而成的，所以，必須在特定的論述形成與實踐中，理解產生論述的特定歷史及制度的場所 (Hall,

---

<sup>4</sup> 國族成為對共同體想像的一種方式，實際上是一把「雙面刃」：在對外時，它深化著權力、自主性和共同體統一性的利益，抵抗外部強大的國族及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支配勢力，是對抗強大外部勢力的一道防線；對內，這個抵抗外來強權結構的防線，本身也是一種支配的權力，同時扮演著壓迫性的角色，否定了共同體的多重多元結構性，以國家認同、統一與安全為名，壓制內部的差異與反抗 (麥可·哈德、安東尼奧·納格利，2002: 171-175)。

1996b: 4)。他曾斷言，社會往往將那些違背共識者視作異常者，共識設下了遊戲規則，以此界定誰應該受到譴責或是社會約束，如果共識被解釋成常識，就會影響到人們將某些事物的解釋視作理所當然，不容置疑（Hall, 1982: 62-63; 鍾永昌, 2003: 97）。一般來說，在一個族裔上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社會中，經常會將保存政治與文化認同當作較高的價值，以致於，外來移民較一個異質社會來得更容易被視為安全的威脅（Stivachtis, 2008: 3）。

相對地，從外部來定義則是透過「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來達成。所謂「外部他者」可進一步分為三類：第一類，特別與國族形成的初期階段有關，像是欲從支配的國族或多國族國家的族群中，尋求解放或區別自身的那些人；第二類，則是和敵對國族或國族國家有關者，亦即「我群」的鄰國，其欲爭奪「我群」祖國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我群」宣稱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這類型的「外部他者」可能會導致領土邊界的重新定義，或者突顯出「我群」的領土復國主義傾向，並且強調「我群」的特定族裔獲文化概念來支持這種傾向；第三類，領土與「我群」緊鄰但不爭奪領土邊界，反而是主張擁有構成國族過去的特定神話、象徵或祖先等文化遺產之權利的國族、國族國家或族群，其對「我群」的獨特性與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脅，從而使「我群」為了主張那些爭奪中的象徵或神話是自身的文化資產，而必須重新定義自身的認同（Triandafyllidou, 1998: 599-603）。因此，在一國的政治界線與族群界線存有落差現象時，如果一國內部的少數族群在國界之外有同胞（co-nationals）建立的國家，就容易引發 Abeyasinghe M. Navaratna-Bandara 所謂的「巨鄰併發症」（the “Big Neighbor Syndrome”），<sup>5</sup>使得一國的少數族群政治深受邊界政治的影響，因為這些族群混居的地帶很容易被當作國家之間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戰場。尤其

---

<sup>5</sup> 「巨鄰併發症」是 Navaratna-Bandara 在討論族裔分離主義衝突（ethnic secessionist conflict）時所採用的分析參考座標之一，是一種透過由上而下的方式來分析衝突管理的過程。如果一國境內的少數族群是一種跨境族群，當血親國家（kin state）的族群在中央政府掌握有意義的權力平衡時，則在族群衝突中支持該少數族群的可能性很大。也由於親緣關係的存在，額外增加了情感要素（emotional element）作為工具性動機，導致地緣政治環境的巨大差異。這對該國將造成一種安全威脅的心理壓力（Navaratna-Bandara, 1995）。

是，國與國之間在歷史上存有仇恨的複雜關係時，像是泰、緬或泰、越等，這種現象更容易發生。

美國社會學者布魯巴克（Rogers Brubaker）曾在一篇題為〈新歐洲的國內少數民族、國族化國家以及外部祖國〉（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文章中，提出由國族化國家（nationalizing state）、國內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以及外部祖國（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等要素所構成的三角關係（triadic nexus），藉此來分析東歐諸國複雜難解的民族問題及其動態關係（Brubaker, 1995）。

在布魯巴克的三角關係架構中，所謂的國族化國家，是指一個由核心族群作為基礎經過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過程所形成的國家。此類型的國家為建構單一國族而採取所謂的「族裔國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sup>6</sup>意欲透過各種特殊措施來達成核心族群在語言、文化、政治及經濟等各方面的控制。然而，並非所有的少數族群都能接受這樣的同化過程，所以，有時會導致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其次，外部祖國是指和這些國內少數民族具有親屬關係的其他國家。這些國家認為，他們有義務來促進與他們有族裔親屬關係的少數民族的社會福利和權利、並繼而支持這些少數民族的行動。這種現象在少數民族受到國族化國家的國族主義政策時更加明顯。這時，外部祖國就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具有很強的政治意涵，這種政治行為就可視為是外部祖國的國族主義，也就是國族化國家的「外部他者」。最後，國內少數民族則是不同於核心族群的少數族群，他們希望得到國族化國家對其作為一個具有族裔文化差異的族群的肯認，以及擁有基於族裔的文化和政治權利。由於歐洲的新興國族國家，因文化邊界與政治邊界的差異，導致眾多人民居住在其國族疆域（national territory）之外，雖然他們在公民身份上是歸屬於所居住的新興國族國家，但是，在族裔國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則是歸屬於外部祖國。一旦外部祖國被國族化國家視為主要的威脅時，統治當局經常會將少數民族視為威脅國家內部穩定及

---

<sup>6</sup> 族裔國族主義乃主張國族群體乃是共享一種歷史的疆域、共同的神話與記憶、一種大眾的公共文化、對所有成員的單一經濟和共同的權利與義務的已命名的人類整體——「族裔共同體」（ethnic community）（Smith, 1991: 43）。

國家安全的要素 (Brubaker, 1995: 111–118; 左宏願, 2012: 7–8)。所以，在一個國族化國家中，有問題的更可能是那些具有外部關係的國內少數民族，亦即國族化國家的「內部他者」。

必須注意的是，布魯巴克所提出的國族化國家、國內少數民族及外部祖國等三要素中的每一個，都不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給定的 (given)、不可化約的實體，而是要被視為一種有差異性及競爭性的場域，是競爭各造間進行鬥爭的競技場。所以，三要素之間的三角關係，是一種相關領域之間的關係，並且，三者之間的各種關係是被緊密的糾結在一起，既是內部的，也是構成性的，形成一種相互作用的動態關係 (Brubaker 1995: 118)。

整體來看，國內少數民族／「內部他者」被視為是從內部侵蝕國族的統一性或同一性，外部祖國／「外部他者」則是從外部挑戰國族的領土或文化完整。當國族國家面臨社會、政治或經濟危機而使得國族認同被當作問題提出時，「有意義他者」的角色將變得更加突顯，因為統治者為了克服危機，必須透過共同的敵人來團結人民，同時，「有意義他者」也不斷地提醒人民「我們是誰」，並強調「我們是不同與獨特的」。換言之，在危機時期，「有意義他者」經常變成一種代罪羔羊。統治者大多採取對境內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衝突的鄰國的不同族裔，激發負面意識。正如 Likhit Dhiravegin 所主張的，像泰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較常採取上述的途徑來進行國族建構，因為泰族國家致力將泰國維持成一個族裔同質性的社會，為此必須透過尋求共同敵人來創造國族集體認同並維持國族的統一 (Dhiravegin, 1985: 400)。所以，泰族國家對於非泰 (non-Thai) 人口的認知，就將其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不是避免其整合或變成泰國公民，就是強迫他們拋棄自身的族裔認同並擁抱「泰族特性」 (Thainess)。

綜上所述，本文的分析架構可簡單的以圖 1 來表示。首先，A 與 B 的關係，深受地緣政治變遷的影響，可能是敵對關係，視對方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或者是友好關係，視對方為合作夥伴。其次，A 與 C 的關係，受到 A 與 B 關係的影響，A 對 C 可能採取不信任／支配關係，不願意授予公民身份或是採取強制同化政策，抑或採取溫和同化或多元主義的政策；C 對 A 則可能採取消極逃避、主動同化、爭取權利，甚至發動分離



主義等策略。再者，B 與 C 的關係，受到 A 與 B 關係的影響，B 有可能將 C 視為代理人，從事顛覆任務，也可能支持 C 作為 A 的國民，成為國族共同體的一份子；C 對 B 則可能尋求保護或支援，或是尋求與 B 統一，抑或對 B 保持文化上的認同，扮演 A 與 B 關係間的中介角色。



圖 1、布魯巴克的三角關係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 三、戰後越南人移入泰國的過程

從字義上來看，旅居海外的越南人稱為 *Người Việt Hải Ngoại* 或 *Việt Kiều*（越僑），也就是英文所稱的 *Overseas Vietnam*。根據 Goscha 的研究，*Việt Kiều* 這詞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未曾出現。在 19 世紀末及 20 世紀初所出版的字典中，並未將該詞彙編入。他在 1914 年的文獻中，先後找到的是 *Việt Kiều Cu* 及 *Kiều Bào*（僑胞）等詞彙；之後才在 1928 年的烏隆（Udon Thani）政治組織—「越南人親愛會」（*Hội Việt Kiều Thân Ái, Viet kieu Friendship Association*），以及 1930 年代出版於順化（Hue）的報紙（*Tiếng Dân*）中找到（Goscha, 1997）。但無論如何，*Việt Kiều* 並不是一個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的詞彙，旅

居海外的越南人鮮少會以此自稱，大部分是自稱為 *Người Việt Hải Ngoại* (*Overseas Vietnam*)，有時也會自稱為 *Người Việt Tự Do* (*Free Vietnam*)。至於 *Việt Kiều* 一詞，則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用以指稱旅居國外的越南人。延伸其義，泰國越南人 (*Việt Kiều Thái Lan*) 就是指稱居住在泰國的越僑 (*Wikipedia n.a.*)。

基本上，泰國的越僑可以粗略分為「舊越僑」(*Old Việt Kiều, or Việt Kiều Cu, Việt Cu*) 及「新越僑」(*New Việt Kiều, or Việt Kiều Moi, Việt Moi*) 兩類。所謂「舊越僑」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抵達泰國的越南人，這群人也被泰國人稱為古代越南人 (*Yvon Kao or Ancient Vietnamese*)，由於移入時間較長，其後裔大都已同化成泰族人；相對地，「新越僑」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抵達泰國的越南人，特別是 1945 年至 1946 年間，為躲避法國武裝鎮壓而跨越湄公河進入泰國東北者，也就是泰國內政部所稱的「越南難民」(*Yvon Oppayop or Yvon Mai*) (*Sripana, 2006: 2*)。若再進一步區分，抗法戰爭 (*Franco-Vietnamese War*) / 第一次印支戰爭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期間移入泰國者，可稱「舊」的越南難民；而 1975 年以後，因西貢陷落所引發的難民潮則是「新」的越南難民。本文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抵達泰國的越南人作為關注焦點。

### (一) 1945-46 年間移入者：「舊」越南難民

1884 年，第二次越法順化條約簽訂以後，越南正式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在越南的殖民官員與公民將越南人視為奴隸的殘忍對待，導致越南人的憤怒逐漸升高，而且，越南人還面臨貧窮與基本需求不足的困境，所以，他們選擇離開祖國，嘗試到寮國、柬埔寨等鄰國尋找較適合生活的地方。之後，他們再離開寮、柬等國，進入暹羅。往後的十年間，越南出現所謂的勤王運動 (*Phong trào Cần Vương*)，即是由愛國士紳領導的反法武裝鬥爭。許多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越南愛國志士，像是潘佩珠 (*Phan Bội Châu*)、潘廷逢 (*Phan Đình Phùng*) 等，就開始進入暹羅尋求支持其反殖民運動 (*陳輝燎, 1973: 86-115*)。與此同時，由於暹羅正面臨法國對上湄公河流域的殖民擴張。法國的殖民侵略乃將暹羅朝廷與越南人連結成一個統一體。因為，暹羅可以利用反法勢力來牽制法

國的領土擴張主義，所以，當越南人為逃離法國殖民統治而避難到暹羅時，曼谷當局不僅提供援助，更將其組織起來，共同對抗法國；相對地，越南人以暹羅領土作為反殖民運動基地，不僅較寮國與越南來的安全，而且，暹羅也能提供反抗運動所需之人員及物資的甄補，使得暹羅成為越南人反殖民運動的最佳基地，像是胡志明（*Hồ Chí Minh*）所領導個的共產組織（*Sripana*, 2013: 530–535; *Goscha*, 2000）。這時期，由於泰國缺乏移民法，在 1912 年至 1937 年間抵泰的越南人，就自動取得泰國的公民身份；1938 年以後，由於泰國與法國殖民政府簽訂條約，凡進入泰國的越南人必須保留其法國臣民的地位，所以，必須向泰國當局申請外國人登記證。據統計，這批越南移民超過 3,000 人（*Varophas*, 1966: 234）。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首次執政的披汶政府（*Field Marshal Phibunsongkhram*, 1897–1964）採取親日的外交路線，引發文人領袖普里迪（*Pridi Bhanomyong*），籌組一種兼具「反日運動」和「對抗獨裁體制」等雙重目標的「自由泰」運動（*Khabuan Kaan Seri Thai, the Seri Thai*）。普里迪希望能和亞洲地區的國族主義力量聯合起來，特別是，為寮國、柬埔寨及越南等國尋求獨立的革命團體，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標。相對地，披汶政府為尋求印度支那人民對其在西印度支那的抗法戰爭的支持，乃對越南人、寮族人及吉蔑人展開新的自由移民政策（*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鼓勵印度支那人民跨越湄公河移入泰國邊界地帶。他認為，提升沿邊界地帶的越南人口數目，將有助於對抗法國；而且，早在前現代時期，曼谷的菁英就已經常透過這種方式來有效地守住邊陲地帶（*Goscha*, 1999: 118–119）。故而，有越來越多的越南人選擇自寮、東移入泰國，並落腳在泰、寮邊界附近的邊境地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儘管歐洲殖民體系已經崩潰，但法國仍企圖繼續控制印度支那。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以後，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簡稱越盟 *Việt Minh*）隨即展開一連串的奪權運動，總稱為「八月革命」；同年 9 月 2 日，胡志明於河內宣讀越南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DRV*）的獨立宣言，成立獨立政府，統治著北緯十六度以北範圍的領土，同法國展開為期八年的抗法戰爭。寮國范薩拉親王（*Prince Phetsarath*）則在永珍（*Vientiane*）組織「自由寮」（*Free Lao, Lao Issara*

寮國伊沙拉) 臨時政府，發表獨立宣言。與此同時，同盟國也根據波茨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的決議，<sup>7</sup>率軍進入印度支那。

法國除在越南的南部地區擴展勢力範圍，並在整個印度支那進行恢復統治的工作。由於湄公河沿岸乃是越南抗法愛國志士及寮國伊沙拉的聚集區域，當法軍進入寮國時，就針對湄公河岸的越南移民進行嚴厲的暴力鎮壓。1946 年 3 月 21 日，蘇法努旺親王 (Prince Souphanouvong) 及其大批越南軍隊與法國聯軍在他曲 (Thakhaek) 進行交戰，「自由寮」軍隊傷亡慘重，在損失 700 名士兵與 300 名平民以後，決定撤退。此次事件導致許多人為逃離而橫渡湄公河進入那空帕儂，許多來不及脫身的越南人則遭到法軍槍殺 (Conboy, 1995: 2; Gunn, 2005: 180)。概略地說，來自寮國他曲的越南人定居在沙功那空 (Sakon Nakhon) 及那空帕儂 (Nakhon Phanom)；來自沙灣拿吉 (Suwannakhate) 者居住在那空帕儂的穆達漢 (Mukdaharn)，有些則進入烏汶府 (Ubon Ratchathani) 的耶梭通 (Yasothon) 與安納乍能 (Amnart Charoen)，其餘則進入黎逸府 (Roi Et) 與瑪哈沙拉堪府 (Maha Sarakham)；來自巴色 (Pakse) 者居住在烏汶府的幾個區，有些則居住在素林 (Surin) 及四色菊 (Sisaket) 等府 (Varophas, 1966: 235)。當這些越南人首次移入泰國時，曼谷當局並未系統性的登記或控制，不過，據泰國警察後來的估計，1946 年 3 月，有將近 5 萬的越南人逃離法國的壓迫，這數字還不包括寮國人及居住在伊森地區的越南人。<sup>8</sup>在 1975 年以前，這次是越南人逃往國外最大一波的難民潮。

基本上，泰國內政部將這些人稱為「越南難民」(Vietnamese Refugees) 或「新越南人」(Yuan Mai)，藉以和先前移入的越南人作出區別。在這時期，因普里迪領導的文人政府對越南及寮國的獨立建國組織具有同情心，並不關心這些越南移民親共產主義及越盟；同時，因為這些來到泰國的越南移民是法國壓迫下的犧牲者，所以，政府要提供他們人道援助，包括：住屋、食物、醫藥、土地與工作，特別是營建業，

---

<sup>7</sup> 根據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二次大戰結束後，北緯 16 度以北的印支半島 (包括寮國大部分地區與越南中、北部) 由中國受降，以南的地區 (包括柬埔寨、越南南部) 由英國受降。

<sup>8</sup> 根據 Peter A. Poole 的深入研究，1945 年至 1946 年移入泰國的越南人數為 46,700 人 (Poole, 1967b: 324)。

像是建設與修繕道路等 (Sripana, 2004: 4-5)。在他們之中，有三種類可以取得官方的登記文件：第一，那些在 1941 年因法泰戰爭而被迫進入泰國，居住在柬埔寨暹粒 (Siem Reap) 及馬德望 (Battambang) 兩省，並 1946 年柬埔寨兩省被歸還給法國以後，希望重新被安置在泰國東部省份的越南人；第二，從事泰、越之間的海洋貿易，並在泰國沿海城鎮建立起關係網絡的越南人；第三，1945 年的難民，亦可經由各種管道取得官方登記文件。然後，這三類越南移民就被統稱為外國居民 (Vietnamese Foreign Residents) (Walsh, 2011: 164)。

## (二) 1975 年後移入者：「新」越南難民

1973 年 1 月 27 日，美國在與南越、民解及北越於法國巴黎簽訂「終止越南戰爭暨恢復和平協定」(Agreement on Ending the War and Restoring Peace in Vietnam) 後，正式自越南撤軍。然而，在巴黎停戰協定筆墨未乾之際，北越已經準備向南進攻。缺乏美軍支援的南越，根本無力與北越抗衡。1975 年 4 月 21 日，北越在接收南越中央高地與沿海諸省後，隨即向西貢進軍。在沒有美國的支援下，南越軍隊又鬥志盡失，西貢政權終於陷落。

根據統計，1975 年西貢陷落時，過去曾為美國服務的南越人，成員包括：中產階級、農民與西貢軍人等，約 140,000 人撤退並到美國安頓下來。同年年底，則有 5,000 名越南人逃往泰國，4,000 人至香港，1,800 人至新加坡，1,250 人至菲律賓。1976 年 7 月，河內政府解除南越成立的臨時革命政府，將國家統一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許多不滿新共產政權的人，因為恐懼被野蠻的對待，像是城市居民被「自願」安置在鄉間所謂的「新經濟區」(New Economic Zones)，超過百萬人被安置在再教育營 (re-education camps)，加上食物短缺等因素，約有 15,000 名越南人於 1977 年在東南亞國家尋求庇護 (Cutts 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0: 81-82)。1978 年及 1979 年越南先後和柬埔寨及中國都發生軍事衝突，惡化了經濟與社會局勢，觸動第二波大規模的難民潮。嚴重的排華浪潮使這波逃離者多為越南的華裔，約佔 70%。<sup>9</sup>

---

<sup>9</sup> 1978 年起，越南政府決定再度徹底推進南越的社會主義改造，加強國家對所有生產

從這波難民潮的移動路線來看，陸路僅有兩條：一是往北進入中國，另一是經由柬埔寨往西進入泰國，<sup>10</sup>但是，由於旅途中會歷經赤柬、柬埔寨士兵、強盜等威脅，在進入泰國之前，必須徒步越過地雷區，以致於，成功抵達聯合國難民營者僅約一半。至於海路，則有四條：往東北至香港；往東至菲律賓；西南至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往東南向澳洲（Vo, 2005: 130-142）。其中，經海路往泰國者，大多是從南部海岸湧入，那邊海岸線有 1,000 公里長。1976 年 6 月，泰國政府在南部城市宋卡（Songkhla）建立了難民營。當時，泰國灣正值海盜出沒的高峰期（1970 年代末期與 1980 年代），許多來自南越的難民經常遭遇海盜的暴力攻擊而喪失生命。根據表 1 顯示，在 1975 年至 1995 年間，越南船民共有 796,310 人，抵達泰國者共計 117,321 人，佔所有越南船民的 14.7%；另外，從陸路抵達泰國的越南人則有 42,918 人，約佔印支三國難民總數的 6.7%。

表 1、印支難民首次庇護之國家，1975-1995 年

首次庇護的國家／領土	1975-79	1980-84	1985-89	1990-95	總計
越南船民					
香港	79,906	28,975	59,518	27,434	195,833
印尼	51,156	36,208	19,070	15,274	121,708
日本	3,073	4,635	1,834	1,529	11,071
大韓民國	409	318	621	0	1,348
澳門	4,333	2,777	17	1	7,128
馬來西亞	124,103	76,205	52,860	1,327	254,495
菲律賓	12,299	20,201	17,829	1,393	51,722
新加坡	7,858	19,868	4,578	153	32,457
泰國	25,723	52,468	29,850	9,280	117,321
其他	2,566	340	321	0	3,227
小計	311,426	241,995	186,498	56,391	796,310
泰國（內陸）	397,943	155,325	66,073	20,905	640,246
柬埔寨人	171,933	47,984	12,811	4,670	237,398
寮國人	211,344	96,224	42,795	9,567	359,930
越南人	14,666	11,117	10,467	6,668	42,918
總計	709,369	397,320	252,571	77,296	1,436,556*

資料來源：Cutts 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0: 98)。

手段和消費物資的統一管理和組織化，停止所有資本主義商人的活動，其中，所謂的資本主義商人指的就是華人，所以，華人被視為是改革的主要障礙，並被冠上「反革命份子」與「危險資本主義者之成員」，在此情形下，華人紛紛逃回中國。華人問題引發中、越導致中、越兩國公開對立（白石昌也，1992: 140; Hood, 1992: 142）。

<sup>10</sup> 柬埔寨邊境被稱為「越南人的跳板」（Platform Vietnamese）（Vo, 2005: 155-156）。

#### 四、冷戰時期的泰國越南人：國族政治與強權介入交纏下的代罪羔羊

##### (一) 戰後泰國對越南認知的轉向：從「反殖戰友」到「安全威脅」

1945年，胡志明率領越盟取得獨立。作為一個新興獨立國家的領袖，首要任務就是尋求國際社會的承認。故而，他在宣布獨立的15天以後，就開始尋求蘇聯的援助；之後，他更派遣官員向中國、美國、英國請求援助來停止法國的入侵。但是，有兩個主要因素阻礙著北越尋求外交承認：第一，冷戰在東歐地區形成，導致西方國家對亞洲地區由共產主義所領導的反殖民運動感到憂慮；第二，因胡志明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資深成員，這事實為法國殖民主義者提供一個絕佳的藉口，使其得以重返印度支那，並否定越盟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正當性(Toan, 2007: 62-63)。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以後，越盟領袖將此視為一個取得國際援助與外交承認的絕佳機會。胡志明認為，美國支持法國已經是個無可避免的事實，與莫斯科及北京保持緊密的關係，對越盟在印度支那取得勝利將是最好的機會。所以，胡志明決定公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正式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此後，中共開始積極支援胡志明領導的越盟，協助共產勢力向大陸東南亞的南方擴張，導致冷戰體制在東南亞地區正式形成。

同樣地，1947年披汶透過政變重新取得政權。他的地位已經跟四年前執政時有很大的不同。披汶為鞏固政權，必須尋求政變團體以外的支持，透過政治的方法，像是妥協而非直接強迫來拱維持其地位(Nuechterlein, 1965: 58-59; Chaloeontiarana, 2007: 43)。基本上，作為一個軍事獨裁政權，披汶必須在國家的內、外領域尋求介入衝突，才能保證其政治合法性和國族主義建構的成功。特別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粉碎了泰國將變成一個東南亞超級強權的美夢。披汶及其顧問必須認清現實，泰國只是一個小國家，周邊所圍繞的緬甸、越南及馬來亞等國的共產黨，對現有政權的挑戰及威脅，已經引起人們的驚慌(Flynn, 2001: 18-19)。這意謂著，反共政策將成為政治領袖在面對國內及國際社會時，能夠賦予權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最高道德原則。唯有如此，才能

規避英、美等西方國家對於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儘管 1948 年 5 月 3 日，美國正式承認披汶政權的正當性，但是，在乃賓（Phin Choonhawan）、沙立特（Sarit Thanarat）及乃拋（Phao Sriyanond）所構成的「三巨頭」式（*triumvirate*）的權力分享關係下，披汶為強化其脆弱的地位，必須轉而透過外交政策來求取援助，與美國這樣的帝國強權結盟（Chaloemtiarana, 2007: 55-56）。

然而，在中國落入共產勢力的控制、韓戰爆發以及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出現以前，美國的興趣及其所認知的主要利益並不在東南亞。即使英國遠東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強烈主張：美國應該在東南亞促進一個友好、穩定的非共政府。可是，美國仍然將重心放在歐洲大陸。直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而在中國建政，並且，奉行向蘇聯一面倒政策，成為蘇聯在亞太地區擴散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代理人。共產主義對亞太地區的威脅讓美國相信圍堵戰略（*containment strategy*）是必要的，從而大大提升泰國在美國東南亞政策的重要性。故而，美國決定對泰國展開軍事及經濟上的援助。不過，真正的軍事介入仍然有限與不確定（Fineman, 1997: 54-125）。直至 1950 年 6 月 25 日，歐洲的柏林封鎖危機解除後，蘇聯鼓動北韓向南擴張，意欲以共產勢力控制朝鮮半島，於是北韓在蘇聯與中共提供武器的協助下向南韓入侵，引爆韓戰；同時，中共也積極支援胡志明領導的越盟，協助共產勢力向大陸東南亞南方擴張。此後，東亞地區的冷戰體制正式形成。

隨著冷戰氛圍在東南亞地區擴散，泰國受到先天地理與戰略位置的影響，被美國視為遏制共產主義的堡壘，以及美國勢力範圍的延伸地區（Baker and Phongpaichit, 2005: 146）。泰國從戰前「東南亞的社會主義窗口」和「反殖民基地」被推向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之間意識型態對抗下的「前線國家」。在華盛頓的戰略佈局中，如果能夠保持泰國的自由與獨立，東南亞的心臟地帶與其他地區就可以存活，成功的關鍵就在於泰國統治菁英心中的反共意識（Mungkandi, 1982: 91）。正如 Frank C. Darling 所指出：

泰國位居大陸東南亞的中心，構成一個戰略地區。1948 年以後，  
周邊國家捲入和前殖民地統治者（印度支那及印尼）或是當地



共產主義叛亂（緬甸及馬來亞）的軍事衝突。對美國的決策者而言，泰國就像是混亂區域中的一塊穩定的綠洲。任何不利於美國與軍事威權政權合作的阻礙都必須被克服，因為美國必須保護東南亞免於落入共產主義者的統治。毫無疑問，泰國已經變成防禦東南亞的決定性基地（Darling, 1967: 215）。

美國的戰略思維乃給予披汶證明其親西方政策的機會。所以，披汶政府將外部的區域安全優先於內部政治與經濟發展（Mungkandi, 1982: 131）。如果內部政治等於保持軍事官僚恩從體系的順利運作，那麼，符合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至少是解決內部政治對抗的一種方式（Tandrup, 1985: 259）。披汶除了頒佈反共法案（the Anticommunist Act, 1952），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像是主動派兵參加韓戰、承認南越保大（Bao Dai）政權及加入美國所倡議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 SEATO, 1954），藉以強化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此後，泰國變成美國的一個軍事統治下的附庸國家，而披汶的軍事政權則是受到了鞏固。

1970年代以前，有三個主要因素導致泰國統治菁英對於骨牌理論和共產主義擴張的論調深信不疑：第一，北越取得抗法戰爭的勝利；第二，巴特寮（Pathet Lao）在寮國政治中興起；第三，泰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CPT）的擴散。<sup>11</sup>對他們來說，骨牌理論根本無須解釋，當共產主義往前推進時，就已經靠近國家大門的台階。任何共產黨

---

<sup>11</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無論在組織上或意識型態上，泰國境內的共產黨並未取得明顯的進展。直至1942年12月1日，泰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T）召開，正式宣告泰國共產黨的成立。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泰國嚴格執行反共法案，對共產黨採取鎮壓的政策，大大的限制了泰共的活動空間。直至1962年，美國軍隊開始移入泰國境內，給予泰國共產黨鼓吹和動員愛國主義來為國家獨立鬥爭的好機會。期間，泰共根據武裝鬥爭的革命策略來制訂各種計畫，例如：1962年建立東北地區叢林總部，結合農民解放公會（Farmers' Liberation Association）等其他組織來支持游擊勢力；同時，泰共的秘密廣播—「泰國人民之聲」（Voice of the People of Thailand, VOPT）也開始播送，大力攻擊美國介入越戰及其在泰國駐軍的行為。1965年5月起，由北京和河內所認可之「泰國獨立運動」（T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TIM）形成。同年11月，該獨立運動更與北京和河內所創建的「泰國愛國陣線」（Thai Patriotic Front, TPF）反政府運動結合，並接受亞洲共產強權的援助，使得泰國幾乎要成為「另一個越南」（another Vietnam）（Nuechterlein, 1967; Wongtrangan, 1982; Marks, 1994）。

更進一步的侵犯行動都是不利於泰國的國家安全 (Mungkandi, 1982: 91)。所以，泰國軍事政權必須藉由參與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支那的反共陣營，來予以回應。其中，所謂共產主義威脅的驅動者無疑是胡志明所率領的越盟。泰國統治菁英相信，越盟不僅要對抗法國且取得越南獨立，同時，也意圖奪取寮國與柬埔寨。在他們的認知中，泰國的東北地區將是共產主義意圖支配全東南亞的下一站 (Girling, 1968; Kirk, 1968: 8)。就像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 1965 年 1 月所聲稱的：「武裝鬥爭將很快在泰國開始，而且，泰國將是下一個展開民族解放戰爭的地區」 (Kerdphol, 1986: 23-24)。

這時期，隨著北越提升對南越軍事鬥爭的強度，迫使美國國會在 1965 年 8 月 7 日通過「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正式授予美國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步驟的權力，導致越南局勢急遽變化 (Current History, 1968)。與此同時，泰共隨即在同一天乘勢於東北地區的那空帕農府發動第一次武裝鬥爭行動。泰國人認為，泰共之所以在北部、東北部及南部地區全面擴散的原因，是受到南越內部共產勢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 NLF) 叛亂加劇的影響。根據骨牌理論，南越不僅是左右寮、東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泰國的。所以，泰國軍事政權必須保護南越及寮國，這也是泰國提供軍事基地給美軍進行越戰的動機。1967 年，泰國甚至組成「皇后眼鏡蛇志願軍團」(Queen's Cobra Regiment) 進入南越作戰 (Ruth, 2010)。泰國總理他儂 (Thanom Kittikachorn) 告訴泰國人民：

我們必須盡其所能防止越戰結束於南越戰敗，我們必須確定戰爭結束於共產黨侵略者的撤離與南越的勝利。理由是共產黨在南越發動侵略，而且，他們正將侵略行動擴散到其他東南亞國家……他們對泰國境內的各種顛覆運動展現支持的態度，並且，為破壞宗教、行政等傳統制度與泰國族和平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擴大活動……我們認為，必須參與自由世界同盟來對抗共產主義邪惡的計畫 (Bangkok Post, 1967)。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以及駐軍達到高峰：由美國訓練和裝備起來的泰國軍隊和警察總數達 26 萬人；另外，在泰國的 7 個重要空軍基地、9 個重要的戰略通訊中心、6 個特種部隊司

令部和一個海軍基地，再加上，美國所駐紮的 5 萬名軍隊。正如學者 Peter F. Bell (1978: 64) 所形容的一樣：「泰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整個國家簡直成了一個要塞」。儘管如此，泰國鎮壓叛亂活動的措施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更關鍵的是，泰國政府為掃除共產黨勢力而幾近濫用權力的結果，就是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更大的分裂，從而給予共產黨叛亂活動更大的成長空間。1973 年 10 月，當泰國爆發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時，泰共的活動範圍幾乎涵蓋了三分之二的國土。

1970 年代中期，隨著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的力量與人數大幅的成長，長期依賴美國支撐的軍事政權則因美國自越南的撤軍而導致地位逐漸衰弱，甚至垮臺。此後，泰國政治進入短暫的「民主實驗」(Democratic Experiment) 時期 (Morell and Samudananija, 1981: iii)。不過，1975 年，印度支那三國解放的消息震驚泰國的統治階層。越南和柬埔寨被赤化，普遍都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共產主義在兄弟之邦—「寮國」取得勝利，就創出一波歇斯底里 (hysteria) 的恐懼情緒。同時間，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提出報告顯示：印度支那的局勢為泰國共產黨創造有利的條件，泰國境內的游擊隊顯得活動相當活躍，所以，叛亂活動將是泰國最大的威脅。儘管社尼 (M. R. Seni Pramoj) 及庫立特 (Kukrit Pramoj) 等文人政權開始採取和平共存的對外政策，和印支鄰國發展正常化的外交關係。<sup>12</sup>不過，極右派的他寧 (Thanin Krivichien) 執政時，軍方認為和印支共產國家發展關係將影響泰國內部安全，所以，泰國對印支鄰國外交政策又回歸對抗的路線。

整體來看，冷戰時期的泰國統治菁英，因深陷在共產主義威脅的恐懼中，乃將胡志明所率領的越盟及北越政權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換言之，北越是作為一種反共地緣政治的外部他者而存在，而且，此種認知也進一步主導著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及政策制訂。

---

<sup>12</sup> 庫立特認為，與越、寮、柬等三個共產鄰國尋求有好且互利的關係，將是泰國得以與其和平共生的唯一方式；擔任外交部長的察猜 (Chatichai Choonhavan) 也提出泰國與鄰國外交政策的新途徑：基於彼此對主權、領土完整的相互尊重，不侵略、不介入彼此的內部事務 (Maisrikrod, 1994: 48)。

## （二）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認知及政策：反共地緣政治的內部他者

1950 年代，在泰、美結盟的架構下，泰國自然也和法屬印支政權站在同一陣線。泰國東北地區的越南難民發現，曼谷當局藉口他們是北越共產黨入侵的先行者，逐漸限制他們的移動與人權；然後，這種指控也被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東北地區從事游擊戰的抗日領袖，而這些人大多是披汶的政治對手。這些舉措被那些信奉反共產主義且因擔任反叛亂顧問、技術人員、利他主義的學者而來到泰國的美國人，予以合理化且大力的提倡（Flood, 1977: 37）。所以，在普里迪執政時，獲得官方與民間支持而能自由移動、自由選擇居住地點的越南難民，被強制再安置於東北邊境的 13 個省分（參見圖 2），未得到特別允許無法移動到這區域之外，主要目的是防止共產主義影響力擴散到主要的人口中心。然而，泰國政府在重新安置越南難民的地方，控制力相當薄弱，反而將其暴露在越盟的影響力之下，越南難民實際上仍然可援助從寮國滲透而來的越盟或巴特寮。1950 年，泰國政府開始與法國合作，有限度地控制越盟在泰、寮邊境上的活動。所以，越南難民也被集中在東北的 5 個省分（參見圖 2）；翌年，內政部公布一連串的法規，要求越南難民在移動到其他省分以前，必須獲得地方當局的允許（Poole, 1970: 46-47; Boonwana, 2002: 80-89）。1951 年，乃拋將軍擔任警察指揮官以後，越南難民再次被強制安置到 8 個東北邊境省分的區域，然後，未經曼谷當局的許可，限制移動到區域外；同時，地方當局也獲得全權委託，任何時候可以不經控告與審判而將其入獄（Flood, 1977: 37）。同年，越南難民登記中心（Registration Center of Yuon Oppayop）或越南難民辦公室（office of Yuon Oppayop）也在警政局轄下成立，負責收集資訊、檔案報告，起草關於越南人的相關法則與條例，以及追蹤其移動與活動概況（Sripana, 2006: 4）。

1953 年，泰國政府公開表示，恐懼中共在雲南地區成立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Sip Song Panna Autonomous Tai region），以及在此地或越北可能被組織的自由泰運動；而寮國受到中共與越南重大的影響，也成為泰國恐懼的因素之一（Wilson, 1961）。外部局勢的變化導致曼谷當局對越南難民的壓迫益加惡化，因其懷疑越南難民秘密援助越盟游擊

隊。共產主義即將越界進入泰國的恐懼，驅使曼谷當局於 5 月 22 日將 500 名男性越南難民從廊開以火車遣送到博他倫（Phatthalung）等西南偏遠省分以南的難民營區（Grossman, 2009: 68）；在 6 月 22 日把 126 名越南領導幹部從廊開、沙功那空和那空帕儂等府遷移到素叻府（Surat Thani）（王偉民，1985: 24; Boonwanna, 2002: 104-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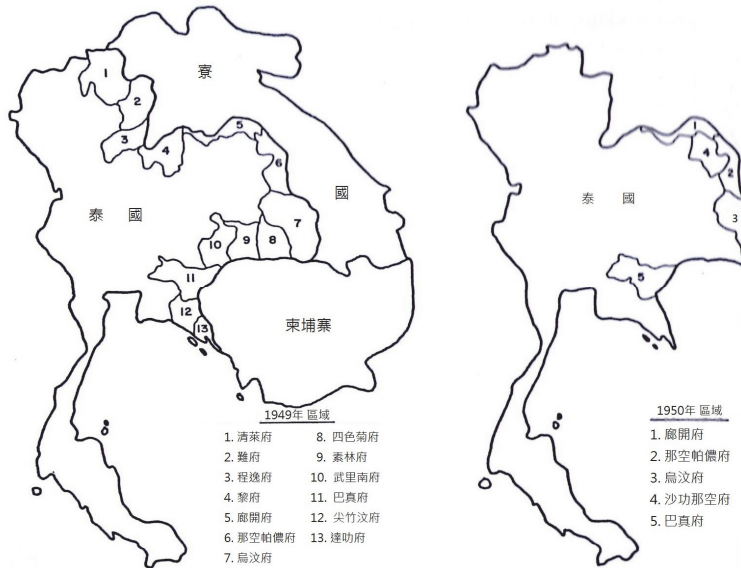


圖 2：越南難民集中的區域，1949-1950 年

資料來源：Poole（1970: 46）。

1954 年，日內瓦停戰協定簽署以後，法國勢力正式撤出印度支那，越南分裂為蘇聯和中國支持的北越，以及美國支持的南越。美國當局認為，泰國政府應將泰國東北的越南難民遣返到美國控制下的西貢政權。因為，遣返難民是一種宣傳勝利的手段，可藉以主張西貢政權的正當性。泰國政府則認為，越南難民留在泰境之內，猶如不定時炸彈，所以，放棄像對待華人那樣，將其融入泰國社會的嘗試，而是亟欲將其遣返。1955 年 4 月，在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上，泰國代表就正式向南、北越代表提出難民遣返的問題。同年 11 月，當泰國王室前往東北地區視察而行經廊開時，當地警方接獲刺殺國王的密報，根據消息指出，

廊開府當地的越南難民中的越盟游擊隊，計畫刺殺蒲美逢國王，因為泰國反對越南領袖胡志明統一國家，並使其免於法國和美國支配的努力。泰國警方隨即逮捕五名越南難民，不過，內政部宣布因缺乏證據證實該刺殺計畫而後將其釋放（Grossman, 2009: 82）。1957 年，沙立特掌權以後，在美國強勢的軍、經援下，成立了極端恐怖的反共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組織。據估計，每年至少有 200 到 300 名越南難民未經審判而被迫入獄；與此同時，許多泰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被捕，迫使共產黨轉進鄉村地區，採取毛澤東式的「農民革命」或「人民戰爭」（people's war）的武裝鬥爭（Bowie, 1997: 62-63; Wongtrangan, 1982: 57-58）。由此顯見，泰國統治階層對於越盟與越南難民的深切恐懼。

1960 年代，受到美國的反抗叛亂併發症（counter-insurgency syndromes）的影響，曼谷當局也對越南難民展開各種對抗活動，例如：將越南難民描繪成「間諜」、「恐怖主義者」、「危險的共產黨人」等負面形象；或者，將越南難民描述成「越南人的種族與文化在泰國的小先鋒部隊」。就像泰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一樣，越南難民也是共產主義從事顛覆活動，以及東北分離主義者裂解東北領土的溫床。所以，必須由泰國安全單位按照限制法則與條例來嚴加控制與監視。總之，東北地區的越南人已經變成泰國的一個「問題」。然後，越南難民發現他們自己被越來越多的限制所包圍，根本就是否定其基本人權，包括：在取得曼谷警察總部的許可以前，越南難民禁止從居住地移動；沒有官方允許，不得有在家過夜的訪客；不能與泰國人進行婚嫁；他們的小孩，即使在泰國出生，大部分不能取得泰國公民身份、不能就讀泰語學校。如果越南難民想自己開設學校，將被視為介入共產主義活動，並且，被指控為忽視其母國的文化（Flood, 1977: 38）。這意謂著，越南難民被迫維持自己的族裔認同；理由則是為了維持泰國族共同體的純淨。這明顯是基於種族主義的思維。

承此思維，曼谷當局堅持將越南難民遣返。然而，從北越的角度來看，其可利用泰國境內的越南人從事情報收集，以及假其與泰共聯絡，從而達到自身的目的（Poole, 1970: 95-109）。所以，對於遣返難民一事顯得並不積極。自從萬隆會議以後，河內並未與曼谷針對遣返一事有過接觸。直至 1958 年 8 月，泰國對外辦公室要求泰國紅十字會副主席春波

王子 (Prince Chumbhot) 與北越紅十字會談判遣返難民的可能性。經過多次談判，1959 年 8 月 14 日泰國與北越兩國紅十字會最終在緬甸首都仰光達成協議 (Rangoon accord)，規定 1960 年至 1966 年間，將用船舶把 45,033 名越南難民遣返北越 (Poole, 1970: 57-70)。1960 年 1 月，搭載第一批被遣返的越南難民的船艦 (MS Hoi Ying) 抵達北越的海防港，艦上共有 922 名乘客，包含 514 名孩童。大部分是在 1946 年逃離寮國與越南的家，並在泰國東北地區居住超過 14 年。由於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日漸升高，截至 1964 年 7 月，約進行 75 個航次，共有 46,256 名越南難民遭到遣返 (Grossman, 2009: 109)。

除了遣返越南難民，泰國政府的控制這也隨著泰國共產黨叛亂活動的升高而益加嚴厲。1972 年以前，關於泰國國籍的取得乃是根據屬地主義原則 (*jus soli*)，即使父母不具備泰國籍，但在泰國出生的子女都可以取得泰國籍。1972 年 12 月 13 日，泰國軍政府頒布革命委員會宣言第 337 號 (Decla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Council No. 337)，對於國籍法中的屬地原則引入一有意義的限制，規定父母親若不具泰國籍者，其子女即使在泰國出生，亦無法取得泰國籍，同時取消自 1913 年到 1972 年以此方式取得泰籍的所有非泰籍父母所生子女的泰國籍 (王懷清, 2015: 40)。

進入 1973 年以後，隨著泰國政治進入短暫的「民主實驗」時期，泰國出現相對的出版自由，東北地區的越南難民乃致力突顯其困境，希望能吸引泰國人民的注意力。數百名越南人家庭的家長與個人，更向曼谷地區的先進的新聞報紙投書，詳述其人權所遭遇到的壓迫與殘暴的對待 (Flood, 1977: 38)。然而，1975 年印度支那三國的赤化，使泰國統治菁英再度陷入共產主義威脅的恐懼中。越南的統一對泰國造成的安全關注是，曼谷當局恐懼河內會透過其與泰共的持續關係及越南難民而介入泰國的國內政治。因為，河內當局總是高喊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與激進勢力 (Tung, 2010: 73)。1976 年 8 月，儘管泰國與越南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雙邊友好關係並未立即發展，曼谷當局仍憂慮越南難民是越南的秘密代理人。泰國前內政部副部長 Samak Sunthonwet 甚至指出越南將秘密入侵泰國的計畫，而且明確指出三條入侵路線：第一，經由北部山區，該處是泰、寮、緬邊境交會之處；第二，從寮國南部跨

過湄公河抵達烏汶；第三，經由柬埔寨進入泰、柬邊境城市亞蘭 (Aranya Prathet)。他進一步提到，越南並非真的希望遣返越南難民，反而是想要利用他們作為入侵泰國的先鋒隊 (Flood, 1977: 41-42)。

1977 年 7 月 18 日，越南與寮國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同意越南派駐四萬至五萬名軍隊於寮國，導致寮國喪失作為泰、越緩衝國的地位；1978 年 11 月，越南與蘇聯簽訂為期 25 年之友好合作條約。越南一連串的動作加深泰國統治階層的憂慮，並於 1978 年 12 月 23 日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而達到高峰。根據當時對泰國內部菁英的調查顯示，泰國菁英幾近一致同意的認為，越南入侵並佔領柬埔寨已經明顯影響泰國的安全，而安全威脅又可分為幾個面向：第一，沿著泰、柬邊境的軍事緊張；第二，大量難民的流入；第三，柬埔寨成為越南威脅泰國的主要基地。<sup>13</sup>然而，泰國統治階層對越南的負面意識，不僅僅存在於國家層級的政治菁英，地方領袖也是如此。根據 Likhit Dhiravegin 的研究顯示，泰國地方領袖最不信任及不信任者，包括：緬甸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與寮國人。緬甸人作為泰國歷史上的傳統敵人，已經深深烙印在泰國人的心智上；後三者則受到當代與泰國關係之影響，邊境戰爭、難民問題及共產政權都是促成泰國地方領袖形成反印度支那意識的主要原因 (Dhiravegin, 1985: 401-405)。

整體而言，整個冷戰時期，泰國統治階層將其境內的越南難民和河內緊密的連結，而將其視為國家、國族及領土完整的重大安全威脅。泰國政府長期在媒體上發表陳述，指責越南社群庇護共產黨員，意圖藉由游擊叛亂去穩定化泰國，從而導致許多曼谷地區以外的泰國人，對居住在其周遭的越南人產生負面意識。在極端的反共主義及反越南人意識之下，長期對境內越南難民採取強硬的壓迫政策，而無法享有許多工作、專業訓練、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儘管有部分越南難民已經在泰國居住數十年並取得泰國公民身份，但多數仍無法取得泰國國籍而處於無國籍 (statelessness) 的困境，使其成為泰國族共同體的「境內的局外人」

---

<sup>13</sup> 柬埔寨落入越南的勢力範圍以後，因越南無法完全鎮壓反抗武裝勢力，導致他們流入泰、柬邊境以為庇護所，並透過東、泰邊境居民，取得物資補給以擴大勢力。泰國對柬埔寨武裝勢力的支持，成為越南入侵泰國之藉口，所以，越南大舉陳兵于泰國邊境，藉以對盤踞於東、泰邊境的柬埔寨反抗軍發動軍事攻勢 (Paribatra, 1984; Viraphol, 1985: 27)。



(Crossette, 1985)。從族裔認同的角度來看，儘管有少數的越南難民完全融入伊森文化中，但是，大部分的越南難民仍對越南保持強烈的依附感，亦即，越南是他們的母國。他們從未忘記根源，並試圖盡可能的保存越南文化，像是祖先崇拜的傳統、傳統服飾、新年節慶、生活習慣等。其中，泰國越南人對於胡志明相片及雕像的崇拜更是重要的象徵之一。

越南難民對越南的這種根基性依附 (*primordial attachment*)，對本質上屬於種族主義的泰國族來說，無疑是一種威脅。然後，由於官方國族主義的倡導，在泰國人民心智中灌輸一股反越南人意識，雖然越南人受到反叛亂法的管理，但泰國人仍強烈要求政府將其遣返。在此情形下，即使越南人與泰國人在生活上有緊密接觸，他們仍然對泰國當地居民懷有一種疏離感與敵意，進而成為越南人與泰國當地社群產生衝突的根源。舉例而言，當越南人出外從事夜間活動時，就經常受到泰國年輕人的攻擊，穆達漢地區的當地人甚至將這種攻擊型態稱為 *Tessakarn Tee Kaew*，意指攻擊越南人的節慶 (*Vietnamese bashing festival*)。在越南人的農曆新年 (*Tet Nguyen-Dan*, 泰特節) 期間，他們甚至在住屋前豎立起招牌，表明這是「泰國人的房子」，藉以避免遭到泰國人打家劫舍或因襲擊導致身體受到傷害。顯然，泰國的越南人經常遭受到來自當地居民的重大壓力，迫使其必須調整自身的生活方式，才能取得泰國當地人的接納 (Udomsilp, 2011: 145)。

必須注意的是，泰國統治階級與泰國人民對於越南難民的態度不必然是統一的；即使單就泰國人民而論也會因為省分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Chaloemchai Phiurueangnon 1981 年所撰寫的碩士論文中就曾指出，「在那空帕儂府，大部分的人相信越南是一個侵略性的國家，其中，男、女受訪者的比重分別是 77.4% 與 76.92%；相對地，在瑪哈沙拉堪府，男、女受訪者的比重則下降至 41.96% 與 37.05。另外，在那空帕儂府，大部分受訪的男、女，對於越南難民懷有負面情感，比重分別是 79.45% 與 79.23%，對越南難民懷有正面情感者，男、女的比重則僅有 4.90% 與 9.23%；相對地，在瑪哈沙拉堪府，受訪男、女對於越南難民懷有負面情感的比重則下降至 54.57% 與 56.11%，對越南難民懷有正面情感者，男、女的比重則有 20.42% 與 14.71% (Moeller, 2011: 6)。

## 五、冷戰後的泰國越南人：構成泰國族共同體的共同部份

1980 年代，東南亞的區域秩序乃是圍繞著泰、越關係為中心而運轉 (Maisrikrod, 1994: 47)。泰、越關係的變遷不僅帶動東南亞區域秩序的變動，同時，也影響泰國政府對境內越南難民的認知及政策制訂。

### (一) 泰越關係的轉變：從「安全威脅」變成「合作夥伴」

越南自 1975 年統一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均遭遇危機。外交方面，越南在越戰結束以後，採取疏離中國向蘇聯靠攏的對外政策，已引起中國的不滿。1978 年，越南派軍進入柬埔寨推翻親中國的赤柬並建立親越政權以後，更激化中國對越南既存的敵意，且具體轉化為軍事行動，在 1979 年發動所謂的「懲越戰爭」。此外，為要求越南自柬埔寨撤軍，西方各國及東協國家更對越南實施外交孤立、中斷援助及貿易制裁等措施。東協國家更多次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要求自柬埔寨撤軍的議案，獲得通過。經濟方面，越共採取蘇聯模式的中央計畫經濟發展策略 (central planning model, CPM)，導致國內的農業生產不足、勞動能力降低，以及各項經濟指標陷入蕭條的景象，引發嚴重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危機。與此同時，蘇聯基於內、外因素的考量，開始減少對越南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援助，在喪失蘇聯支持的困境下，越共領袖決定採取全方位的改革開放路線。1986 年 12 月，越共第六屆黨代表大會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決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 (Doi Moi)，為越南日後的內部政治、經濟及對外關係帶來決定性轉變。

河內當局意識到，為創造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政治領袖必須進行一場世界觀的轉型革命，摒棄過去支配其意識型態的傳統教義：根據意識型態來區分朋友或敵人，將世界區分成兩極 (two poles)、兩邊 (two sides) 的「兩個陣營，三個革命當下」 (Palmujoki, 1997: 30)，而改與不同的社會政治體系的國家，亦即非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經濟合作與和平共存 (Porter, 1990)。此種多元化 (đa dạng hoá, diversification) 與多邊化 (đa dạng hoá, multilateralisation) 的外交途徑即為越南對外政策上的新思維：避免依賴單一特定國家的經、軍援助，例如蘇聯，改以積極融入國際經濟；不管意識型態，盡可能培養朋友，但避免被任何經

濟強權所支配；強化與提倡雙邊關係，經由外交手段提升越南的安全。據此，越南希望和區域國家及其他亞太國家打造新的發展，改善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同時越南也已經準備好和區域國家談判解決東南亞的現存議題，並且，在和平共存的基礎上建立關係，將東南亞建設成一個和平、穩定與合作的區域（Cam, 1993: 15; Yeong, 1992; Dosh and Tuan, 2004: 197; Dosh, 2006: 242）。為此，越南的首要任務就是從柬埔寨撤軍，並徹底解決柬埔寨衝突；其次，則是尋求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擴大越南融入區域及參與全球化進程的管道。<sup>14</sup>1987年起，在越南的支持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PRK）的首相兼外交部長洪森（Hun Sen）與民主柬埔寨（Coalition Government of Democratic Kampuchea）領袖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開始展開談判，開啟了和平解決柬埔寨衝突的契機。

當越南在經歷巨大的「質變」時，泰國的經濟發展正進入所謂的「黃金十年」。快速的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導致原物料及能原供給的短缺，而蓬勃發展的製造業則亟需擴展新市場。故而，無論天然資源或市場潛力，印支鄰國都將是泰國政府的最佳選擇（Turley, 1993: 184）。更何況，泰國聯合政府的內閣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閣員都具有商業背景。<sup>15</sup>林業、漁業、礦業及旅遊業等天然資源導向的經濟活動所蘊含的龐大商業利益，迫使泰國政府必須向印支開放（Weatherbee, 1993: 201）。此時，印支局勢的變化改變了泰國政治菁英對世界及國家利益的界定，進而帶動了泰國對外政策的再次轉向。

---

<sup>14</sup> 越南加入東協的益處有二：經濟上，東協國家可以協助越南取得投資、經濟合作及適當的技術，同時，越南需要日本、南韓、台灣、香港與美國來作為投資的主要或潛在的來源，與重要的貿易夥伴；政治上，由於東協的國際聲望，取得東協成員資格可以提升越南的外交地位，並將越南的安全與東南亞整體的安全融合在一起，然後，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Tuan, 1993: 283, 1994: 261-267）。

<sup>15</sup> 1986年8月，普瑞姆執政時，企業背景的閣員人數僅有21人，佔全體閣員人數的44.7%。然而，往後的歷屆政府中，具有企業背景的閣員人數比例都高達七成以上，分別是：1988年8月的察猜內閣為33人，佔總數的73.3%；1992年4月的川立沛內閣為37人，佔總數的77.1%；1994年12月的第二次川立沛內閣為39人，佔總數的81.3%；1995年7月的班漢內閣為43人，佔總數的89.6%；1996年11月的察瓦利內閣為40人，佔總數的83.3%（Laothamatas, 1988: 454; Unger, 1993: 81; Bowornwathana, 2001: 286）。

1988 年 8 月 4 日，察猜（Chatichai Choonhavan）上台以後，重申與印支國家友好的外交政策。他宣佈：「與鄰國之間的關係，例如寮國及越南，必須改成市場並不是戰場，柬埔寨問題也是如此。我們需要柬埔寨和平，亦是為了增加邊界的貿易」（楊明玉，2004: 69）。此外，他也主張：「政治是政治，貿易是貿易，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任何人都應該可以與其想要的對象進行貿易」（Choo, 1988）。此即著名的「察猜主義」（Chatichai Doctrine）的經貿外交政策：「business of diplomacy is business」（Um, 1991: 246）。之後的川立沛（Chuan Leekpai）政府也認為：「泰國是印支的金融門戶，並扮演印支半島與世界之間的橋樑角色」（引自 Buszynski, 1994: 727）。顯然，泰國印支政策的基本主軸已明確地從安全考量轉向貿易及投資（Um, 1991; Innes-Brown and Valencia, 1993）。

1991 年，印支半島的局勢也因巴黎「柬埔寨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ccord）的簽署而更趨緩和，各項次區域經濟開發計畫，包括：「泰銖經濟圈」（Baht economic zone）、「黃金四角」開發計畫（Golden Growth Quadrangle, GQ）及「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rogramme, GMS）等，也隨之興起。

由於泰、越兩國在世界觀上的轉型，以及次區域經濟合作發展之需要，雙方的外交關係取得迅速地進展。1990 年代，泰、越雙方的黨、政、軍高層曾經展開多次的互訪，其中，泰國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於 1992 年 11 月訪問越南，更是泰國王室高階成員的首次出訪（參見表 2）；再加上，越南分別與中國（1991 年）、美國（1995 年）等強權的外交關係邁向正常化，而且，在泰國積極的倡導之下，越南順利的「東協化」（ASEANization），正式成為東協的成員。<sup>16</sup>明顯地，過去支配泰、越關係的相互懷疑與不信任感已開始消退。泰國統治菁英

---

<sup>16</sup> 關於越南加入東協的問題，東協成員國的立場並不一致。除了共產主義威脅的因素以外，印尼一向認為越南的加入會威脅其在東協內部的領導地位，乃持反對的立場。不過，泰國則持贊成的態度。1990 年代初期，擔任泰國總理的安南德（Anand Panyarachun）就不僅制訂發展援助計畫來經援鄰國，更積極提倡擴大東協，鼓勵印支鄰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在此情形下，越南在 1992 年 7 月 22 日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 1995 年 7 月 28 日順利加入東協（Wheeler, 2001: 32）。

相信，泰、越和睦將有利於泰國的政治及經濟，也是曼谷當局制訂區域戰略的基礎。

表 2、泰、越兩國的黨、政、軍高層互訪一覽表

泰國黨、政、軍領袖訪問越南	越南黨、政、軍領袖訪問泰國
1989.11.22-25 副總理 Bitchai Rattakul、1992.01.15-17 總理安南德 (Anand Panyarachun)、1992.11.15-20 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 (Maha Vajiralongkorn)、1993.03.17-23 公主詩琳通 (Maha Chakri Siridhorn)、1994.02.2-5 國會主席 Marut Bunnag、1994.03.16-19 總理川立沛 (Chuan Leekpai)、1995.10.1 總理班漢 (Banharn Silpa-Archa)、1997.03.30-31 總理察瓦利將軍 (Gen. Chavalit Yongchaiyudh)、1997.09 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1998.02 外交部長素林 (Surin Pitsuwan)、1998.11 公主朱拉蓬 (Chulabhorn Mahidol)、1999.03.2-5 副總理兼內政部長 Sanan Kajomprasai 將軍、1999.05 公主朱拉蓬、1999.11 副總理 Bichai Rattakul、2000.04 公主詩琳通、2000.06 公主朱拉蓬、2001.03 外交部長素拉傑 (Surakiart Sathirathai)、2001.04.25-26 總理塔信 (Thaksin Shinawatra)、2001.11 公主朱拉蓬、2002.04 樞密院主席普瑞姆 (Prem Tinsulanonda)、2003.02 與 12 公主朱拉蓬、2006.10.26 總理素拉育 (Surayud Chulanont)、2007.12 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2008.03 總理沙瑪 (Samak Sundaravej)、2008.01 與 05 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2008.07 公主朱拉蓬、2009.02 席特 (Kasit Piromya)、2009.07 總理艾比希 (Abhisit Vejjajiva)、2011.11.28 總理盈拉 (Yingluck Shinawatra)、2012.12 參議院副主席蘇拉猜 (Surachai Liengboonlertchai)	1978.01.2-9 外交部長阮維楨 (Nguyễn Duy Trinh)、1978.09.6-10 總理范文同 (Phạm Văn Đồng)、1990.05.28-31 越南人民解放軍參謀長段奎 (Đoàn Khuê)、1990.09.25-30 國會主席黎光道 (Lê Quang Đạo)、1991.10.28-30 總理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1993.10.15-18 越共總書記杜梅、1996.09.3-7 國會主席農德孟 (Nông Đức Mạnh)、1997.08.9-11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阮孟琴 (Nguyễn Mạnh Cẩm)、1998.08.6-8 總統陳德良 (Trần Đức Lương)、2000.03.23-27 副總統阮氏萍 (Nguyễn Thị Bình)、2000.05.9-12 總理潘文凱 (Phan Văn Khải)、2003.02.12-17 國防部長範文茶 (Phạm Văn Trà)、2003.09.16-19 國會主席阮文安 (Nguyễn Văn An)、2006.12.21-22 總理阮晉勇 (Nguyễn Tấn Dũng)、2012.02.06 外交部長範平名 (Phạm Bình Minh)、2012.06.20-25 副總統阮氏緣 (Nguyễn Thị Doan)、2013.06.25-27 越共總書記阮富仲 (Nguyễn Phú Trọng)

資料來源：Vietn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7, 2009a)。

進入 21 世紀以後，泰、越兩國仍致力從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Asian Financial crisis) 的困境中加以掙脫。首先，越南認為，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落後將是越南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Phong, 2002)。故而，越共領袖決定加強經濟改革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力度，積極推展經濟外交(economic diplomacy)，將外交活動聚焦在五個主要領域：第一，加速越南融入區域與世界經濟的過程；第二，提倡對外貿易，特別是開拓新市場與擴大舊市場，提升商品、服務與勞力的出口；第三，爭取官方援助及其他經濟援助，解決越南的外債；第四，提倡旅遊業與技術轉移；第五，動員海外越南僑胞來促進國家發展(Dosh and Tuan, 2004: 203)。

在泰國方面，塔信(Thaksin Shinawatra)於 2001 年執政以後，回歸 1990 年代經濟導向的外交政策路線，強調不介入鄰國內部事務的原則，關注如何與印支鄰國追求經濟利益與合作，希望利用經濟發展的外交政策來擺脫國家自金融危機後所面臨的經濟困境。所以，他要將泰國建設成運輸網絡的中心，以及製造業與農業產品的區域生產基地。這種透過投資、貿易等領域的經濟整合來強化夥伴關係與維持和平及繁榮的對外策略，就稱為「進取性外交政策」(Forward Engagement Policy)。在塔信的外交世界裡，印支鄰國是泰國主要的國家利益所在，因具有地理的鄰近特性及安全的敏感性，所以，被視為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對象，必須與其維持良好及友善的關係(Chachavalpongpun, 2010)。相較於曼谷及南部導向的民主黨(Democrat Party, DP)執政時，雖然公開地歡迎越南加入東協，不過，仍有許多政府菁英將河內視為國家安全領域上的麻煩製造者；相對地，塔信及其率領的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 TRT)則更願意和越南保持平穩的關係。塔信崛起代表著北部及東北部政治勢力的興起。由於這些政治人物較具商業性及地區性的特質，為確保其政治地位，多傾向支持為其商業及區域帶來利益的政策，尤其是經由「大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架構所進行的合作，更有利於改善伊森地區(Isan)貧困的經濟現狀。因此，立基於東北地區的政黨較為關注政府的印支政策，特別是與泰、越合作有關的政策(Toan, 2007: 138)。

由於泰、越兩國都以提倡經濟發展來作為優先的政策方向，這種經濟導向的外交政策因鼓勵調解而非衝突，不僅為其提供一種較佳的解決

衝突措施，同時，也代表著兩國與鄰國追求互利的意願，從而使得泰、越關係進入一個更為緊密合作的嶄新時代（Ganjanakhundee, 2004）。

泰、越兩國除透過政府高層互訪進行定期性接觸外，2003年雙方甚至簽訂超過30項的協定來支持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與教育等領域的合作（Tung, 2010: 81）。2004年2月，第一屆泰越聯合內閣會議（Viet Nam-Thailand Joint Cabinet Retreat）在泰國那空帕儂召開。會中，雙方簽訂《21世紀泰越十年合作架構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Thailand-Vietnam Cooperation Framework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來作為雙邊關係的指導綱領，同時，也簽訂其他關於雙邊合作的重要文件，像是《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等。過去，無論在泰、越兩國間或任何東協成員國間，都未曾舉行過類似的會議。時隔8年後，泰國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在2012年10月27日率領8個經濟部門的部長出席在河內舉行的第二屆泰越聯合內閣會議，並與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en Tan Dung）就兩國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達成共識。雙方還就政治、經濟、國防安全等各領域加強雙邊合作的重要議題，以及關於兩國教授泰語及越南語等特定議題，進行討論。<sup>17</sup>2013年6月25日至27日，當越共總書記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訪問泰國時，雙方正式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正如泰越友好協會主席巴蜀猜耶山（Prachuab Chaiyasarn）表示，泰、越關係正處於黃金時期，安全、國防、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關係都得到擴大和發展。其中，泰、越合作關係更是有助於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VietnamPlus, 2013a）。

泰、越間的雙邊貿易從1991年起開始出現重大變化，特別是越南加入東協的1995年，雙邊貿易的成長率更達74.6%。時至2013年，泰、越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100億美元（104.5億美元）（參見表3），而且，

---

<sup>17</sup> 會中，泰、越兩國簽署了《泰國與越南第二次聯合內閣會議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Second Viet Nam-Thailand Joint Cabinet Retreat）、《2012-2016 泰國與越南安全合作遠景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Thailand-Viet Nam Security Vision for the 2012-2016 Period），以及《關於建立泰國-越南商會和越南-泰國商會的協議》（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ailand-Viet Nam and Viet Nam-Thailand Business Councils）等3份協議（Vietn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2）。

被預期將以每年 20% 的速度成長，可望在 2020 年時達到 150 億美元（VietnamPlus, 2013a）。另外，因越南的經濟發展與建設取得高度進展，為越南本地及外國投資者創造出良好的投資環境，所以，有越來越多的泰國企業不僅在越南尋求商業機會，<sup>18</sup>更積極謀求與越南公司進行合資企業，尤其在越南最大經濟中心的胡志明市（The Nation, 2014）。目前，泰國對越南投資項目則有 315 個，投資總額達到 64 億美元，是越南的十大投資來源國之一（人民報網，2013）。

表 3、泰、越貿易總額之變化（1994–2013）

單位：百萬美元；%

年別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總貿易額	294.1	513.5	646.7	726.3	823.2	800.6	1,179.4	1,127.6	1,186.5	1,595.5
成長率	46.4	74.6	25.9	12.3	13.3	-2.8	47.3	-4.4	5.2	34.5
年別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貿易額	2,313.2	3,253.5	3,970.5	4,916.0	6,468.3	6,064.0	7,242.1	9,090.7	9,469.6	10,451.2
成長率	45.0	40.7	22.0	23.8	31.6	-6.3	19.4	25.5	4.2	10.4

資料來源：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enter with Cooperation of Customs Development, Thailand. <http://www2.ops3.moc.go.th/>

當然，泰、越關係的轉變除了呈現在兩國黨政高層的交流頻繁以外，媒體界、私部門、學術界等民間社會也改變對越南的觀感。其中，作為提供泰國人民資訊來源的出版媒體，像是隸屬泰國國家多媒體集團（Nation Multimedia Group）的《商業日報》（*Krungthep Thurakit*）與《國家報》（*Khomchatluek*），以及管理集團（Manager Group）的《經理人》（*Phujatkan*）雜誌等，均曾針對越南的改革成就、經濟成長、投資吸引力、政治穩定、國際地位等主題，進行定期性的報導、評論與分析，加深泰國人民對越南的正面印象（Nuchpiam, 2007: 97–104）。此外，泰國人民前往越南旅遊則是另一個瞭解越南的重要途徑。過去，戰爭是影

<sup>18</sup> 2007 年 12 月，泰國前總理安南德（Anand Panyarachun）就曾率領 60 位商業界人士前往越南尋求投資機會。他表示，希望泰國商人的投資活動將有助強化兩國的合作關係（Vietnam Breaking News, 2007）。



響泰國人對越南態度的主要因素，以致於，在 2000 年以前，泰國人前往越南觀光旅遊者大多是政府官員及從事貿易者。2000 年 5 月 9 日，泰、越雙方簽訂《互免簽證協定》(visa exemption agreement)，有助於提升兩國人民的交流；再加上，許多旅遊書籍都將越南描述為富含歷史文化、經濟開放且成功改革的國家 (Moeller, 2011: 67)，吸引越來越多的泰國人民前往越南旅遊，2004 年以後尤其明顯 (參見圖 3)。同樣地，每年亦有將近 50 萬的越南人民前往泰國觀光 (Thanh Nien News, 2004)。目前，泰、越關係雖然已經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不過，除了政府層次的連結外，推動地方及人民等兩個層次的聯繫對發展雙邊關係同屬必要，亦即所謂的「國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巴蜀猜耶山就表示：強化外交與人員之間的交流，對於發展泰、越友好關係是相當有意義的 (VietnamPlus, 20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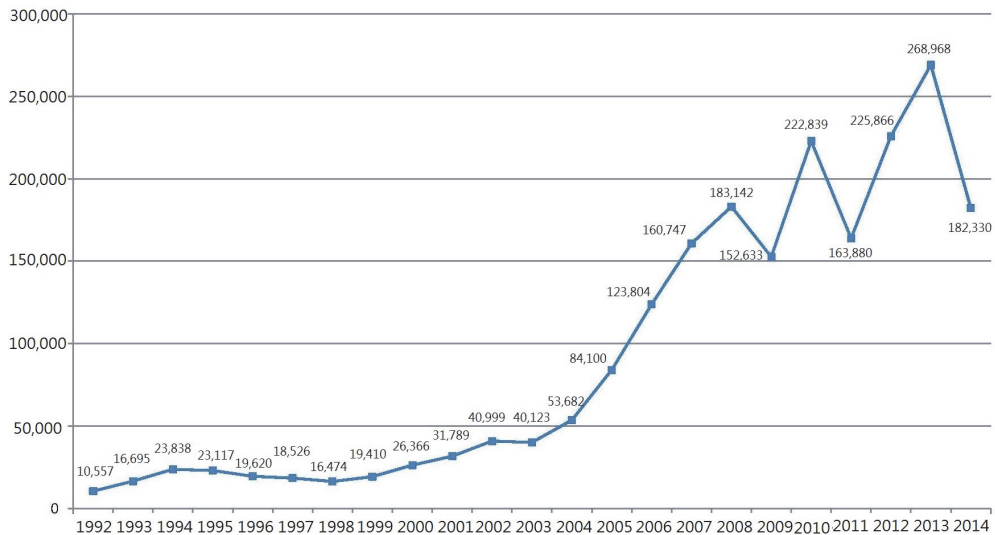


圖 3、泰國人前往越南旅遊的人數發展 (1992-2014)

說明：2011 年數據為 1-11 月；2014 年數據為 1-8 月。

資料來源：整理自 Vietnam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ourism (VNAT).

<http://www.vietnamtourism.com/>

毫無疑問，越南已經從冷戰時期影響泰國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主要「敵人」，變成後冷戰時期雙方尋求共同合作發展的「朋友」（Ganjanakhundee, 2006）。這種認知上的變遷進一步影響著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決策制訂，轉而將越南難民整合到泰國社會中。如此，將有助於泰國社會開始對越南難民抱持更為包容、開放的態度，進而驅使越南難民勇於展現自身的傳統文化與族裔認同。

## （二）泰越友好關係下，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政策轉向

1990 年代初期，由於泰國內部政治的穩定及越南自柬埔寨撤軍，使曼谷當局能以較為和解的姿態來對待越南；相對地，越南也以「廣交友、少樹敵」作為制訂國內、外政策的準則，有助於建立泰國的信任。隨著泰、越關係準備朝向正常化發展，雙方開始思考越南難民問題的解決。在經過 40 餘年的外交僵局之後，泰國政府決定修正與放寬越南難民政策，改採新的同化政策取代過去的遣返政策。

1990 年 5 月 29 日，泰國政府通過第一個關於泰國越南人的內閣決議，建議授予泰國國籍給泰國境內出生的越南孩童。同時，泰國內政部也考慮修訂民事登記法（Civil Registration Act），使越南難民的後代在所有程序上更加公正與便利。另外，國籍問題也將回歸內政部及相關單位的管轄（Chairit, 2010: 55）。翌年 10 月，越南總理武文傑（Võ Văn Kiệt）訪問泰國期間，雙方也曾就越南難民的國籍問題展開談判。由於越南法律不允許公民具有雙重國籍，所以，越南政府支持旅泰越南人成為泰國社會的一部份。1992 年 3 月 17 日，泰國政府決定撤除 1972 年所頒佈的革命委員會宣言第 337 號，授予泰國公民身份給第二代及第三代的越南難民；並裁撤許多組織，像是內部安全指揮部、協調中心等，由內政部指派機構負責越南難民事務，取消威脅國家安全的指導綱領等（Maisrikrod, 1994: 50; Chairit, 2010: 57）。此外，泰國政府也允許泰國人與越南人之間的聯姻，越南女性可以合法地嫁給泰國男性，這是取得泰國公民身份較佳的方式，而且，泰越聯姻所生之孩童可以合法成為泰國公民（Udomsilp, 2011: 146）。2004 年 3 月 9 日，泰國內政部將越南難民改稱越南移民，不僅反映政策上的變化，同時，也反映出想要更加瞭解越南移民的態度（Chairit, 2010: 57）。

根據 Sripana 的研究，在 1993 年至 2004 年 10 月的 13 年間，泰國政府至少實施過 26 次授予法律地位的程序，共計有 25,597 名越南人取得法律地位。儘管如此，並非所有泰國的越南人都被授予法律地位。主要的原因包括：第一，缺乏相關文件，像是出生證明、繳稅收據、職業文件或工作證等；第二，行政官僚作業程序的延遲；第三，國家安全單位懷疑越南人的忠誠問題；第四，國內政治變遷導致內政部官員的更迭等 (Sripana, 2006: 5-7)。

2005 年 12 月，泰國內政部決定重新開始授予法律地位的程序。這對旅泰越南人是相當重要的，因其代表泰國越南人享有和泰國人同樣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權利；同時，也提供泰國越南人同化到泰國社會的一種管道。首先，就經濟面向而言，過去在戒嚴法 (Martial Law, 1972) 及土地轉讓法 (Alienation of Land Act, 1979) 的規範下，泰國政府一向禁止非泰國人擁有土地、在任何商業上控制利益，所以，限制越南人不得從事 39 項的一般職業。故而，越南人取得公民身份不僅有助於工作的選擇，更意謂著掌握財產與經濟資本的權利，開啟越南家庭得以長期儲蓄的起點。此外，泰國政府為鼓勵越南難民不要仰賴政府預算而自食其力，更明訂越南難民得以從事的 27 種職業 (Udomsilp, 2011: 143-144)。其次，就政治面向而言，公民身份的取得就等於取得參與政治的權利，包括：投票、國家層次與地方層次的競選活動等，甚至因此進入泰國的政治圈。再者，就文化面向而言，法律地位的取得提升越南人在正當性的權利，有助於越南文化被泰國社會所承認及尊重 (Toan, 2008)。最後，就社會面向而言，法律地位的取得，代表泰國越南人得以參與社會組織活動，像是各種越南人協會等，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 (Thongkaew, Srisontisuk and Chamruspanth, 2013: 49-57)。

2008 年，泰國政府採取國籍法第四號修正案，其首要目的是解決有關賦予人公民地位的指導方針問題，同時充分考慮到國家安全和人權的共同利益。這包括：恢復某些被取消泰國國籍者的國籍，這些人被取消國籍的理由已不符合當前形勢 (Thailand Law Forum, 2009)。泰國政府希望透過提供管道給予公民身份的取得來降低內部無國籍者的人數。同年，泰國政府也提出民事登記法第二號修正案 (Amendment No. 2)，希望確保在泰國出生的每一個兒童不分族裔都享有出生登記權

(Samuiforsal, n.a.)。

除了為旅泰越南人授予法律地位之外，泰國政府更以政府預算推動各項社會整合措施，例如：建立胡志明紀念館（Hồ Chí Minh Memorial House）及泰、越友誼村（Thai-Vietnamese Friendship Village），以及成立旅泰越南人協會（Thais Race Vietnamese Association）等。

首先，關於旅泰越南人協會，其成立的目的是要提升泰國與越南間的友誼關係，以及擴大兩國間的合作。2008 年起，泰國東北地區的沙功那空、烏隆、廊開及穆達漢等 4 個越南移民較為集中的府已有旅泰越南人協會進行登記。翌年 9 月，越南外交部次長兼旅外越南籍人士國家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State Committee for Overseas Vietnamese）阮青山（Nguyễn Thanh Sơn）則是要求泰國政府，持續為授予旅泰越南移民居留證創造有利條件，並允許他們在曼谷及其他省分成立旅泰越南人協會支部。他強調，大部分的越南移民都是佛教徒，和泰國的國家宗教一樣，希望泰國政府能夠協助越南移民建設佛塔作為宗教活動服務之目的（Vietn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9）。

在泰國當局的鼓勵下，目前則是有約 20 個旅泰越南人協會獲准成立，從事各種活動，包括：第一，提升地方官員的信賴度；第二，在面臨天然災害等情況下，為越南人提供協助；第三，為每一個越南人及泰國人的重要節日安排聚會，像是越南國慶日（9 月 2 日）、胡志明誕辰紀念日（5 月 19 日）、泰國國王生日（12 月 5 日），以及泰、越兩國的新年等；第四，復興與維護越南語言及文化，避免其孩童或下一代淡忘越南傳統；第五，鼓勵旅泰越南人懷有熱愛祖國及其現居土地之意識（Bunchavalit, 2014）。在各界人士、旅泰越南人協會及泰國政府的幫助下，旅泰越南人獲得更多學習越語的場所。舉例來說，廊開府首個教授越語的學校於 2009 年底建成，滿足當地 400 戶越南家庭的需求。廊開府越僑梅文正說：辦學是為了傳授越語，讓子孫後代會說越語，心繫祖國，並繼承越南人的傳統習俗，使他們牢記自己的越南根（越南之聲廣播電台，2013a）。理論上，語言是維持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最主要的元素，泰國政府協助越語教育的發展，亦可見泰國官方態度的轉變。

其次，關於泰、越友誼村，則是座落在距離那空帕儂府農雅縣（Nong Yat）班納桌村（Ban Na Chok）約 3 公里之處。在共產黨擴散的年代裡，

在那空帕儂人的認知中，班納桌村是著名的「越南村」(Vietnamese Village) 或「共產村」(Communist Village)。<sup>19</sup>

自從 1920 年代胡志明在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以後，越南人反殖民運動開始轉向共產主義，許多旅泰的越南人都加入胡志明所成立的越共組織 (Goscha, 1999: 64-113)。<sup>20</sup>1927 年，有一批越南共產黨人在從事反法活動失敗以後，亦流亡到泰國 (王偉民, 1985: 23)。1928 年，創立於新加坡且紮根於東南亞中國移民社會的「南洋共產主義聯盟」(Fédération communiste des mers du Sud) 誕生。這個聯盟的行動受命於遠在上海租界的東方局 (Dalburo)，活動範圍以泰國為中心，伸展至整個東南亞殖民地國家地區。在這個政治架構下，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 (Nguyễn Ái Quốc, 胡志明)，被派遣至泰國重新召集追隨者。1930 年 4 月 20 日，阮愛國在曼谷舉行的會議上宣佈暹羅共產黨 (Siamese Communist Party) 誕生，由阮愛國擔任黨主席。在胡志明旅泰期間，不僅成立泰共組織，同時還在越南人中培育革命幹部、進行革命教育，進而在越南革命者與泰國人民之間建立起友誼 (黃文歡, 1986: 44-52)。當時，胡志明的革命基地就是選在遠離曼谷且距離越南最近的那空帕儂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泰國軍事政權採取親美的反共主義路線，乃將胡志明描繪成共產主義份子與集權領袖，其以共產主義擴張的形式不僅對整個區域的和平、穩定與安全造成威脅，同時，也因胡志明在越南人社群之間受歡迎的程度，使得旅泰越南人就像「第五縱隊」(fifth column)，是泰國國家安全的一個威脅 (Toan, 2008: 80)。越戰期間，泰國政府為消除印度支那的共產黨勢力，乃派遣官兵前往控制班納桌村，並將該區域標示為「紅色區域」(Red Area)，意指對國家安全具有高度威脅。此後，「旅泰越南人是共產黨」的理念就在整個國家散播開來，而

<sup>19</sup> 目前，約有 8,000 名越南人生活在那空帕儂府；而班納桌村超過 90% 的人口為越裔。

<sup>20</sup> 事實上，早在胡志明抵達暹羅以前，已有許多越南人革命組織成立，例如：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1925 年，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在暹羅中部彭世洛府披集縣 (Phichit) 越南人聚居的萬隆村 (Ban Dong) 成立，之後，擴展到越南人聚居的東北各府，包括：烏隆、沙功那空、那空帕儂等府。簡言之，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主要是透過合作會 (the Cooperatives) 和越僑親愛會 (the Việt Kiều Friendship Organization) 來展開群眾活動；另外，越南人聚居的地方，還成立婦女會、青年會、少年會，作為越僑親愛會的組成部分 (黃文歡, 1986: 34-36)。

班納桌村的發展也深受泰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影響。在 1990 年代以前，旅泰越南人甚至害怕公開談論他們最敬愛的領袖—胡志明。

1990 年代以後，隨著冷戰意識型態對抗的終結，以及區域主義浪潮的興起，泰、越兩國關係也取得高度的進展。於是，泰國政府開始轉而指稱胡志明為越南人民的愛國領袖，泰國媒體更公開地將其描寫成「越南的建國之父」( *founding father of Vietnam* )、「偉大的自由鬥士」( *great freedom fighter* )、「越南國族之父」( *father of the Vietnamese nation* )、「越南的國家英雄」( *Vietnam national hero* ) 等 ( *Toan, 2008: 82* )。進入 2000 年以後，泰、越兩國為強化雙方關係，在文化外交領域方面開始啟動關於胡志明歷史遺跡的修建，包括：2001 年，在泰國政府與旅泰越僑的支持下，位於班納桌村的胡志明故居獲得重建；2002 年，在泰、越兩國政府及那空帕儂府旅泰越南人協會等官方支持下開始興建泰、越友誼村；2004 年 2 月 21 日，泰、越兩國在那空帕儂舉行首次聯合內閣會議期間，雙方領袖進一步就泰、越友誼村舉行開幕式；2005 年 5 月，泰國官方也在烏隆府成立胡志明教育與觀光歷史遺跡 ( *Ho Chi Minh Educational and Tourism Historical Site* )；2013 年 12 月，胡志明主席紀念區在泰國披集府 ( *Phichit* ) 帕馬卡比縣 ( *Pamakab* ) 萬隆村 ( *Ban Dong* ) 舉行動工 ( *Toan, 2008: 79*; 越共電子報，2013b )。

基本上，胡志明是越南人所崇拜尊敬的偶像，幾乎像神一樣的敬佩他，所以，懸掛胡志明的畫像就跟神像一樣。1945 年以後移入泰國的越南家庭，大多將胡志明的教條和祖先牌位加以結合，變成所謂的 *Ban Tho To Quoc* ( 意指 *motherland's shrine*, 祖國神龕 )，然後對其展現出高度尊敬 ( *Thongkaew, Srisontisuk and Chamruspanth, 2013: 48-49* )。如此，在泰國族主義的架構下，胡志明的住所及泰國越南人都代表一種非泰 ( *non-Thai* ) 意涵，所以，泰國越南人對胡志明的崇拜必然會遭遇當地泰國社會以國族主義之名而進行批判。因此，胡志明紀念館及泰、越友誼村等歷史遺跡的順利重建，不僅象徵著泰、越兩國在冷戰結束後的相互信任、理解及文化合作和關係的發展，同時，也表明泰國政府對越僑的肯認，以及泰國社會對越南人及越南文化的接受。<sup>21</sup>

---

<sup>21</sup> 事實上，越南政府對於旅居海外的越南人的態度亦有所轉變，認為海外越南人對於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性，所以，鼓勵其參與國家建設與發展越南的對外關係為此，越南

除此以外，泰國社會對旅泰越南人的接納亦可從各種年度宗教慶典及新年節慶的參與過程中，略見一二。舉例來說，新年是越南人最重要的節慶之一。在越南人群聚的那空帕儂，越南人會在新年期間穿著多采多姿的傳統越南服飾，前往越南紀念鐘塔（Vietnamese Memorial Clock Tower）參加慶祝活動，<sup>22</sup>而泰國人民以及各級政府組織的代表也會一同出席慶典（Bunchavalit, 2014: 9-10）。可以說，隨著越南人逐漸在泰國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以後，泰國人民開始願意將其肯認為「越裔泰人」（Vietnamese-Thai），而不再是帶有貶抑意涵的「越南難民」，顯示出泰國社會對於種族接受的逐漸開放。故而，旅泰越南人也無須像過去一樣，必須偽裝或隱藏自身的認同與族裔特性，而是可以在追求國族共同體之集體認同的同時，也展現出個別的族裔認同。2013年6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訪問泰國期間，不僅強調「海外越南人是越南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更期許旅泰越南人能夠「履行作為泰國公民的責任，守法生活和工作，為所在國建設做出貢獻」（越南之聲廣播電台 2013b）。綜上所述，泰國的越南人明顯不再是泰國歷史學者東猜（Thongchai Winichakul）所謂的「內部他者」（Winichakul, 2000），其不僅是構成泰國族共同體的整體部分，更是維繫泰、越關係的重要橋樑。

## 六、結語

本文主要是透過國族化國家、國內少數民族以及外部祖國等三角關係架構來觀察泰國、越南難民、越南等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其動態性可具體的透過圖4來加以呈現，同時，得出以下兩項主要的結論。

---

政府不僅設置海外越南人的工作組織與結構，像是外交部轄下的海外越南人國家委員會，負責與海外越南人相關的各項事宜。關於國籍方面，也修訂國籍法及指導文件，允許海外越南人在具有他國之國籍時，也能保留越南國籍。對於海外越南人的法律地位，越南政府則透過各項國際條約、法律互助協定等方式，為海外越南人在法律地位上創造有利的條件。2007年7月25日，越南總理就簽署建立海外越南人公民與實體保護的決議（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Citizen and Entity Protection for Oversea Vietnamese）（Cuong, 2011）。

<sup>22</sup> 越南紀念鐘塔建立於1960年，是越南難民為了紀念其在越戰結束後能夠返回祖國而建立的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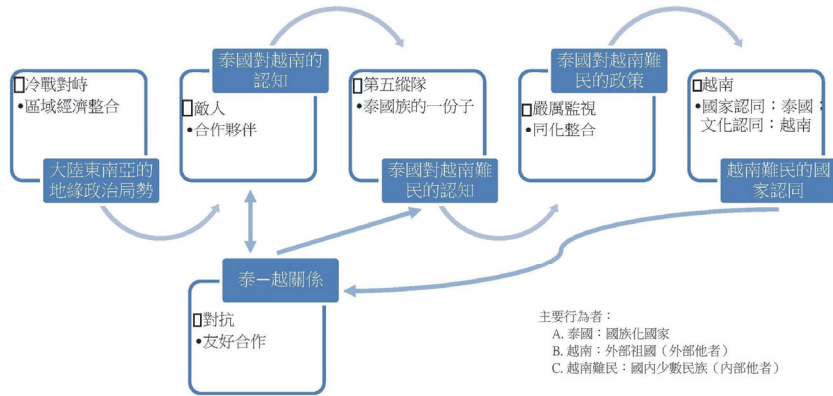


圖 4、泰國、越南及越南難民的動態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首先，泰國政府對於越南難民的態度取決於統治階層對於越南這個外部他者的認知。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期，泰國面臨來自法國殖民的威脅，於是，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越南人就被視為反法鬥爭的盟友，曼谷當局對於越南難民多採取同情的態度，甚至忽視其共產主義的特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泰國政權改由軍人掌控，一方面，軍人政權要仰賴美國的認可來取得正當性，所以，必須服膺美國的反共政策，此時，法國從過去的敵人變成盟友，而越南則從過去志同道合者變成敵人，這種認知的變遷改變了泰國政府對越南難民的態度。越南難民被美國及泰國刻畫成共產主義擴散的先鋒部隊，所以，必須集中管理、限制移動，甚至予以遣返。

同樣地，越南作為海外移民的外部祖國，其對海外移民的認知亦非靜態不變的。在反殖民運動及冷戰對峙時期，無論是胡志明率領的越盟或北越政權，都將泰、寮、柬等國境內的越南移民視為擴大勢力的先鋒隊與軍需物資提供者。這種和海外移民保持緊密聯繫的關係模式，加深了泰國統治菁英對越南難民的恐懼感，並反映在具體的政策制訂上。這兩大要素的交互影響，導致泰國政府長期將越南難民視為異己，拒絕讓他們變成泰國族共同體的一部份，最具體的例證即是越南難民的國籍取得過程。

1990 年代以前，泰國政府曾多次透過國籍法的修訂，使越南難民的



第二代或第三代難以取得國籍和公民身份，無法享受國民所能享有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直至冷戰結束，隨著區域局勢的邁向和平，泰國政府認為國家安全的外部威脅大致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與越南謀求經濟合作關係，從而提升越南難民的重要性，所以，泰國官方對於越南難民的國籍問題顯得較為積極，提升越南難民從泰國的內部敵人變成構成國族共同體一份子的機會。

其次，關於越南難民的國家認同，也是流動的。在反殖民主義時期，進入泰國的越南自認為是短期居留、無意生根的暫居者（sojourner），最終還是要返回祖國越南，所以，對越南仍保持著強烈的祖國認同。從泰國的角度來看，越南難民就是外國居民。冷戰時期，泰國統治菁英因為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恐懼日深，越南難民對於強調同質性的泰國族共同體而言，無疑是要加以排除的敵人。在曼谷當局採行嚴厲的監控政策下，越南難民逐漸成為泰國社會中的「沈默的他者」，亟欲消除或隱藏自身的族裔特性來確保生命財產的安全。

冷戰結束以後，泰國官方不再將越南難民視為國家安全上的威脅，所以轉而協助旅泰越南人保存越南文化，理由除了泰國官方出現多元文化的傾向及北部和東北部政治勢力的興起以外，更重要的是出於鞏固泰、越關係之所必須。這時期，旅泰越南人一方面對越南著個外部祖國懷有文化情感，另一方面，則在國家認同上認同著泰國。顯示出，旅泰越南人已將自身視為泰國共同體的一部份。可預見的是，隨著泰、越雙邊關係日趨緊密，旅泰越南人將在外交關係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同樣地，由於旅泰越南人取得公民身份者逐漸增多，未來也將在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

本文認為，泰國個案對於東南亞國家的族群關係研究深具啟發性的意義。因為，至少在寮國與柬埔寨境內，目前都有為數不少的越南人。特別是對柬埔寨而言，越南在歷史上不僅透過南進運動逐步的併吞了原屬柬埔寨的領土，同時，也曾揮軍入侵柬埔寨並扶植親越政權。在柬埔寨社會中，至今仍有部分民眾對越南人心存恐懼。這種現象不僅會衝擊東、越兩國關係的發展，也會影響即將在 2015 年建設完成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因此，印支各國的越南人（ethnic Vietnamese）議題將是未來東南亞研究的重要課題。

## 參考文獻

### · 中文

- 人民報網。2013。〈越南與泰國加強經濟合作關係〉。<http://cn.nhandan.org.vn/friendshipbridge/vietnam-and-the-world/item/1236501-%E8%B6%8A%E5%8D%97%E4%B8%8E%E6%B3%B0%E5%9B%BD%E5%8A%A0%E5%BC%BA%E7%BB%8F%E6%B5%8E%E5%90%88%E4%BD%9C%E5%85%B3%E7%B3%BB.html>
- 王偉民。1985。〈泰國政府對待越南移民的政策〉。《東南亞縱橫》，3: 23-27。
- 王懷清。2015。《泰國邊境與國家安全政策：以難民的角度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
- 左宏願。2012。〈書評：制度主義視野中的民族問題：讀羅傑斯·布魯貝克《重構民族主義：新歐洲的民族與民族問題》〉。《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106: 5-8。
- 白石昌也。1994。《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ベトナム）（吳瑞雲、田川雅子譯）。台北：月旦出版社。
- 梁志明、游名謙。2004。〈當代海外越南人的分布與發展狀況研究〉。《南洋問題研究》，2: 16-26。
- 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1973。《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Lịch Sử Tám Mươi Năm Chống Pháp）（范宏科、呂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麥可·哈德（Michael Hardt）、安東尼奧·納格利（Antonio Negri）。2002。《帝國》（Empire）（韋本、李尚遠譯）。臺北市：商周出版。
- 越共電子報。2013a。〈旅居泰國曼谷越南人協會正式成立〉。[http://www.cpv.org.vn/cpv/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o\\_id=7338662&cn\\_id=606232](http://www.cpv.org.vn/cpv/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o_id=7338662&cn_id=606232)
- \_\_\_\_\_。2013b。〈泰國披集府胡志明主席紀念區正式動工興建〉。[http://cn.cpv.org.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N\\_ID=628078&CO\\_ID=7338679](http://cn.cpv.org.vn/Modules/News_China/News_Detail_C.aspx?CN_ID=628078&CO_ID=7338679)
- 越南之聲廣播電台。2013a。〈旅泰越僑為越泰關係發展做出貢獻〉。<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

eb&cd=2&cad=rja&uact=8&ved=0CC8QFjAB&url=http%3A%2F%2Ffn.nhandan.org.vn%2Fmobile%2Fmobile\_political%2Fmobile\_national\_review%2Fitem%2F926401.html&ei=gzVEU82dD8qPk gXFsoG4CQ&usg=AFQjCNH7KO2kbSrsGMDxNf0zmXrDclKKLw

\_\_\_\_\_。2013b。〈阮富仲圓滿結束對泰國的訪問〉。http://vovworld.vn/zh-cn/%E6%96%B0%E9%97%BB/%E9%98%AE%E5%AF%8C%E4%BB%B2%E5%9C%86%E6%BB%A1%E7%BB%93%E6%9D%9F%E5%AF%B9%E6%B3%B0%E5%9B%BD%E7%9A%84%E8%AE%BF%E9%97%AE/163449.vov

鄂蘭。1982。《帝國主義》(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two: Imperialism) (蔡英文譯)。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黃文歡。1986。《滄海一粟：黃文歡革命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楊明玉。2004。《泰國與東協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永昌。2003。《構成性域外與共同・體之研究：以「難民」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 外文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aker, Chris and Pasuk Phongpaichit. 2005.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ngkok Post. 1967. Thailand to Join the Fight. *Bangkok Post*, January 7, p. 1.

Bell, Peter F. 1978. "Cycles" of Class Struggl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8(1): 51-79.

Boonwanna, Thananan. 2002. The policy of the Phibulsonggram Regime Regarding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1948-1957.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History,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 Thai)

Bowie, Katherine A. 1997. *Rituals of National Loyalty: An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 Scout Movement in Thailand*. New York: Columbia

- University Press.
- Bowornwathana, Bidhya. 2001. Thailand: Bureaucracy under Coalition Governments. Pp. 281-318 in John P. Burns and Bidhya Bowornwathana, eds., *Asian Civil Service Systems in A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Brubaker, Rogers.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5.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124(2): 107-132.
- Bunchavalit, Patthida. 2014. Thai, Laos, Vietnam: The Contemporary Way of Life and Civilization in Nakhon Phan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April 22-24,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 Buszynski, Leszek. 1994.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a Regional Vision. *Asian Survey*, 34(8): 721-737.
- Cam, Nguyen Manh. 1993. On the Way to Practic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Direction. *Communist Review*, (3): 11-15.
- Chachavalpongpun, Pavin. 2010. *Reinventing Thailand: Thaksin and His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Chairit, Wipoo. 2010.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tnamese Immigrant and the Local Thais in Phatthalung. Master Thessis, Chiang Mai University. (in Thai)
- Chaloemtiarana, Thak. 2007.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sm*.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 Choo, Tan Lian. 1988. Thailand for More Private Trade with Indochina.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9, p. 10.
- Conboy, Kenneth J. 1995. *Shadow War: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Boulder, CO: Paladin Press.
- Crossette, Barabara. 1985. Thais Hostile to Ethnic Vietnamese. *New York Times*, April 3. <http://www.nytimes.com/1985/04/03/world/thais->

hostile-to-ethnic-vietnamese.html

- Cuong, Nguyen Manh. 2011. Policies for Overseas Vietnam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Data for Policy Development, June 1-2, Hanoi, Vietnam.
- Current History. 1968. Current Documents: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 *Current History*, 54(317): 49.
- Cutts, Mark 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0.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rling, Frank C. 1967. America and Thailand. *Asian Survey*, 7(4): 213-225.
- Dhiravegin, Likhit. 1985.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ailand. Pp. 386-409 in *Thai Politics: Selected A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Bangkok: Tri-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 Dorais, Louis-Jacques. 2001. Defining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Diaspora*, 10(1): 3-27.
- Dosh, Jörn and Ta Minh Tuan. 2004. Recent Changes in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ASEAN Relations. Pp. 197-213 in Duncan McCargo, ed., *Rethinking Vietnam*.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Dosh, Jörn. 2006. Vietnam's ASEAN Membership Revisited: Golden Opportunity or Golden Cag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8(2): 234-259.
- Fineman, Daniel. 1997.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Flood, E. Thadeus. 1977. The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Minority Manipulation in Counterinsurgenc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9(3): 31-47.
- Flynn, Robert James. 2001. Preserving the Hub: U.S.-Thai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1-1976.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 Ganjanakhundee, Supalak. 2004. Seeking More Substantial Cooperation with Vietnam. *The Nation*, February 20.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opinion/Seeking-more-substantial-cooperation-with-Vietnam-93900.html>
- \_\_\_\_\_. 2006. Kingdom, Vietnam Mark 30 Years of Ties. *The Nation*, August 7.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home/Kingdom-Vietnam-mark-30-years-of-ties-30010518.html>
- Gellner, Ernest. 1997.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 Giddens, Anthony. 1987.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rling, J. L. S. 1968. Northeast Thailand: Tomorrow's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46(2): 388-397.
- Goscha, Christopher E. 1997. "Viet Kieu" as a Term. <http://h-net.msu.edu/cgi-bin/logbrowse.pl?trx=vx&list=H-Asia&month=9708&week=a&msg=MeQrF49B7wXuQF0Gld6DJg&user=&pw=>
- \_\_\_\_\_. 1998. La présence vietnamienne au royaume du Siam du XVIIe au XIXe siècle: Vers une perspective péninsulaire. Pp. 211-243 in dans Nguyễn Thê Anh et Alain Forest, édés., *Paix et guerre en Asie du Sud-est*. Paris: L'Harmattan.
- \_\_\_\_\_. 1999. *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1885-1954*. Richmond: Curzon Press.
- \_\_\_\_\_. 2000. Vietnames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Early Spread of Communism to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 Toward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4: 1-41.
- Grossman, Nicholas, ed. 2009. *Chronicle of Thailand: Headline News since 1946*. Bangkok: Bangkok Post.
- Gunn, Geoffrey C. 2005. *Political Struggles in Laos, (1930-1954)*. Bangkok: White Lotus.
- Gurr, Ted Robert. 1993.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Hall, Stuart.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 Media Studies. Pp. 52–86 in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t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_\_\_\_\_. 1996a.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595–634 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_\_\_\_\_. 1996b.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Pp. 1–17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Hobsbawm, Eric J. 1992.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Pp. 1–14 in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O.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d, Steven J. 1992. *Dragons Entangled: Indochina and the China-Vietnam War*. Armonk, N.Y.: M. E. Sharpe.
- Innes-Brown, Marc and Mark J. Valencia. 1993. Thailand Resource Diplomacy in Indochina and Myanma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4(4): 332–351.
- Jenkins, Richard. 2004.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Keller, Suzanne. 2003. *Community: Pursuing the Dream, Living the Re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rdphol, General Saiyud. 1986. *The Struggle for Thailand: Counterinsurgency, 1965–1985*. Bangkok: S. Research Center.
- Kirk, Donald. 1968. Report from the Thailand Front. *New Leader*, 51(18): 6–8.
- Laothamatas, Anek. 1988.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New Patterns of Influence. *Asian Survey*, 28(4): 451–470.
- Maisrikrod, Surin. 1994. “The Peace Divid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6(1): 46–66.
- Marks, Tom. 1994. *Making Revolution: The Insurgen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in Structural Perspective*. Bangkok: White Lotus.
- Moeller, David Juergen. 2011. Thai Attitude towards Vietnam as Shown in Contemporary Travel Writing.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Morell, David and Chai-Anan Samudananija. 1981.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Reform, Reaction, Revolution*.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Mungkandi, Wiwat. 1982. The Security Syndrome: 1941-1975. Pp. 59-114 in Wiwat Mungkandi and William Warren, eds.,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Thai-American Relations*.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Navaratna-Bandara, Abeyasinghe M. 1995.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 Secessionist Conflict: The Big Neighbour Syndrome*. Aldershot: Dartmouth.

Nuchpiam, Theera. 2007. Thai Stakeholder's Perceptions of Vietnam and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Asian Review*, 20: 85-123.

Nuechterlein, Donald E. 1965. *Thailand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i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67. Thailand: Another Vietnam? *Asian Survey*, 7(2): 126-130.

Palmujoki, Eero. 1997. *Vietnam and the World: Marxist-Leninist Doctrine and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5-9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aribatra, Sukhumbhand. 1984.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dochina Conflict: Thai Perspectives. *Asian Affairs*, 11(3): 28-46.

Phong, Pham Cao. 2002. Vietnam's New Security Perception: The Role of Economic Securi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3rd Annual ISA Convention, March 24-27, New Orleans.

Poole, Peter A. 1967a. Thailand's Vietnamese Minority. *Asian Survey*, 7(12): 886-895.

\_\_\_\_\_. 1967b. Thailand's Vietnamese Refugees: Can They Be Assimilated? *Pacific Affairs*, 40(3/4): 324-332.

\_\_\_\_\_. 1970. *The Vietnamese in Thailan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4. The Vietnamese in Cambodia and Thailand: The Role in Interstate Relation. *Asian Survey*, 14(4): 325-337.



- Porter, Gareth.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etnam's World-view: From Two Camps to Interdepende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2(1): 1-19.
- Ruth, Richard A. 2010. *In Buddha's Compan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amuiforsale. n.a. Thai Civil Registration Act (No.2) B.E. 2551. <http://www.samuiforsale.com/law-texts/thailand-civil-registration-act.html>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ripana, Thanyathip. 2004. The Vietnamese in Thailand: A Cultural Bridge in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hip. Paper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etnamese Studies, July 14-16, Ho Chi Minh City, organized by the Vietnam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ASS) and the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_\_\_\_\_. 2006.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unnel of the Viet Kieu in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in RCSD Regional Seminar Region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Redefining Local Culture, Space and Identity in the Mekong Region, April 22-24, organized by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CSD),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Thailand.
- \_\_\_\_\_. 2013. Tracing Hồ Chí Minh's Sojourn in Siam. *Southeast Asia Studies*, 2(3): 527-558.
- Sripana, Thanyathip and Trinh Dieu Thin. 2005. *Viet Kieu in Thailand and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 Bangkok: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Stivachtis, Yannis A.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Secur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1): 1-24.
- Tandrup, Anders. 1985. Book Review: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Thai-America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3 (1-2): 259-260.
- Tạp chí Quê Hương trên Internet. 2004. Nghị quyết số 36/NQ-TW ngày

- 26/3/2004 của Bộ Chính trị về công tác đối với người Việt Nam ở nước ngoài. <http://quehuongonline.vn/VietNam/Home/Van-ban-phap-luat/2004/04/1814A7D0/> (in Vietnamese)
- Thailand Law Forum. 2008. Amendment to the Nationality Act 2008 As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Vol.125, on 27 February 2008. <http://www.thailawforum.com/database1/Amendments-to-the-nationality-act.html>
- Thanh Nien News. 2004. Thailand Rescinds Visa Requirements for Vietnamese Travelers. <http://www.thanhniennews.com/travel/thailand-rescinds-visa-requirements-for-vietnamese-travelers-29992.html>
- The Nation. 2014. Thai Firms Seeking New Opportunities in Vietnam.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business/Thai-firms-seeking-new-opportunities-in-Vietnam-30242064.html>
- Thongkaew, Krishna, Somsak Srisontisuk and Viyouth Chamruspanth. 2013. Viet Kieu Families and Pattern Social Mobility in Thai Society. *KK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4(1): 44–61.
- Toan, Nguyen Quoc. 2007. The “Ho Chi Minh Factor” in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_\_\_\_\_. 2008. Ho Chi Minh Sites in Thailand: Their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Problems for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Journal of Mekong Societies*, 4(1): 77–96.
- Triandafyllidou, Anna. 1998.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 Racial Studies*, 21(4): 593–612.
- Tuan, Hoang Anh. 1993. Why Hasn’t Vietnam Gained ASEAN Member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5(3): 280–291.
- \_\_\_\_\_. 1994. Vietnam’s ASEAN Membership in ASE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6(3): 259–273.
- Tung, Nguyen Vu. 2010. Vietnam-Thailand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Pp. 67–91 in N. Ganesan and Ramses Am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 Southeast Asia between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Turley, William S. 1993. "More Friends, Fewer Enemies": Vietnam's Policy toward Indochina-ASEAN Reconciliation. Pp. 167-193 in Sheldon W. Simon, e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M. E. Sharpe.
- Udomsilp, Panupong. 2011. Chaomae Song Nang Worship Ceremony: The Rite that Unites the Vietnamese and Thai Peoples of Mukdahan Province. *Rian T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ai Studies*, 4: 137-153.
- Um, Khatharya. 1991. Thailand and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plex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3(3): 245-270.
- Unger, Daniel. 1993.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in Thailand.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2(3): 66-88.
- Varophas, Kusol. 1966. The Vietna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 *World Affairs*, 128(4): 233-238.
- Vietnam Breaking News. 2007. Thai Businesses Seek Opportunities in Ho Chi Minh City. <http://www.vietnambreakingnews.com/2007/12/thai-businesses-seek-opportunities-in-ho-chi-minh-city/>
- Vietn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7. Vietnam-Thailand Relations. [http://www.vietnamembassy-thailand.org/en/nr070521165956/news\\_object\\_view?newsPath=/vnemb.vn/cn\\_vakv/ca\\_tbd/nr040819104152/ns071212142142](http://www.vietnamembassy-thailand.org/en/nr070521165956/news_object_view?newsPath=/vnemb.vn/cn_vakv/ca_tbd/nr040819104152/ns071212142142)
- \_\_\_\_\_. 2009a. Vietnam-Thailand Relations. [http://www.mofa.gov.vn/en/cn\\_vakv/ca\\_tbd/nr040819104152/ns071212134041/view](http://www.mofa.gov.vn/en/cn_vakv/ca_tbd/nr040819104152/ns071212134041/view)
- \_\_\_\_\_. 2009b. Thai Help for Resident Vietnamese Praised. <http://www.mofa.gov.vn/en/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ns090918093211>
- \_\_\_\_\_. 2012. Viet Nam, Thailand Aim for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www.vietnamembassy-iran.org/en/vnemb.vn/tin\\_hddn/ns121029161200/view?b\\_start:int=115](http://www.vietnamembassy-iran.org/en/vnemb.vn/tin_hddn/ns121029161200/view?b_start:int=115)
- VietnamPlus. 2013a. Vietnam, Thailand Boost Economic Relations in New Era.

- <http://en.vietnamplus.vn/Home/Vietnam-Thailand-boost-economic-relations-in-new-era/20139/39403.vnplus>
- \_\_\_\_\_. 2013b.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Fosters Vietnam-Thailand Ties. <http://en.vietnamplus.vn/Home/Peopletopeople-diplomacy-fosters-VietnamThailand-ties/201310/40962.vnplus>
- Viraphol, Sarasin. 1985. Thailand's Perspectives on Its Rivalry with Security. Pp. 19-30 in William S. Turley, ed., *Confrontation or Coexistence: The Future of ASEAN-Vietnam Relations*. Bangkok: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Vo, Nghia M. 2005. *The Vietnamese Boat People, 1954 and 1975-1992*.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 Walsh, John. 2011. The Vietnamese in Thailand: A History of Work, Struggle and Acceptance. *Acta Universitatis Danubius*, 7(1): 160-172.
- Weatherbee, Donald E. 1993. ASEAN and Indochina: The "ASEANization" of Vietnam. Pp. 194-220 in Sheldon W. Simon, e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M. E. Sharpe.
- Wheeler, Matthew Z. 2001.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1988-2000*. Bangkok: I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n.a. Overseas Vietnam. [http://en.wikipedia.org/wiki/Overseas\\_Vietnamese](http://en.wikipedia.org/wiki/Overseas_Vietnamese)
- Wilson, David A. 1961. Bangkok's Dim View to the East. *Asian Survey*, 1(4): 13-17.
- Winichakul, Thongchai. 2000. The Others Within: Travel and Ethn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iamese Subjects, 1885-1910. Pp. 38-62 in Andrew Turton, ed., *Civility and Savagery: Social Identity in Tai Stat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Wongtrangan, Kanok. 1982.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Proces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Ph. 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Yeong, Mike. 1992. New Thinking in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4(3): 257-268.

## Others or Components of the Thai Nation: A Study of the Thai Government's Perception and Policy toward Vietnamese Refugees

**Wen-Hsuan Hsiao**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amuel C. Y. Ku**

Professor &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emigration waves of Vietnamese into Thailand, and most of them settled in the Isan region of northeastern Thailand. Generally speaking, Thai-Vietnamese or Việt Kiều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two types: "Old Vietnamese" and "New Vietnamese". The former refers to Vietnamese who arrived in Thailand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who are often called "Old Việt Kiều", or "Việt Kiều Cu". Due to their having assimila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 is almost no difference between "Old Vietnamese" and Thais. The latter refers to those who arrived in Thailand after World War II, called "New Việt Kiều", or "Việt Kiều Moi".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latter. From the past until the present, the Thai governments' Vietnam policy, including the policy on the Việt Kiều, is based on the Thai ruling elite'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which is the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 of Việt Kiều. In other words, a particular relational framework between Việt Kiều, Thailand, and Vietnam is form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of Thai-Vietnamese in Thailand well, we need to discuss those key element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relational framework such as Thai nationalist politics, regional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s and Thailand-Vietnam relations.

**Key words:** Thailand, Vietnam, Thai-Vietnamese relations, Vietnamese Refugee, New Vietnamese